

THE RESEARCH ON SOCIAL LIFE OF  
JIAOZUO (1898~1949)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History

By

*Zhao Qianqian*

Supervisor: A.Prof. *Wang Shouqian*

May,2013



## 摘要

晚清民国是焦作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焦作煤炭储量丰富，煤炭开采在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十九世纪末，英帝国主义通过强权获得了在怀庆府治内的开采权，福公司进驻焦作之后，煤矿开采力度加大，矿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建设。人口增多，工商业迅速发展，文化事业也逐渐完善，社会风貌也发生了巨大而显著的变化。

焦作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人员前来做工，人口的聚集和需求的增加活跃了市场，商品化程度较高，社会生活的变迁因而更加迅速、明显。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社会生活最表层的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四个方面，变化最为明显。物质生活变化的同时，精神生活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除了传统的庙会、戏曲娱乐之外，新的娱乐方式如电影、公园、体育等也逐渐进入了日常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婚俗、丧俗、节俗等呈现出文明时尚，但同时保留着就有的传统，并存在一些封建陋俗。焦作社会生活变迁呈现为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的特色，也是中西新旧思想交汇碰撞的结果。

新式学堂的建立，尤其是焦作路矿学堂的建立，使得大批知识分子集聚焦作，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氛围。公路、自来水、剧院、公园等城市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加快了焦作城市化进程。

以这段时间焦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再现焦作地区从晚清到建国前社会生活方面的细节，有利于弥补这一时期有关焦作人们生活状态研究的不足，更好把握焦作“以矿兴市”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历史。

**关键词：**晚清民国 焦作 产业变革 社会生活变迁

## ABSTRACT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are the critical stage for Jiaozuo area's changing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a modern society. Jiaozuo has rich in coal resources, The coal mining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ir daily lives. At the end of nineteenth century, British have gained the power of mining coal in the Huaiqingfu. With the Peking Syndicate Ltd establishing in Jiaozuo and coal mining intensified, the mining economy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Population increas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ulture gradually improve, social features also has changed greatly and significant.

It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personnel to come to 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n Jiaozuo. The population gathered and an increase in demand higher the degree of commercialization. Changes of social life was frequent. People's material life have been enhanced. The most surface of social life like clothing, food, housing, transportation four aspects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inner world was riched day by day. In addition to the traditional temple fair, opera, new entertainment ways like movies, parks, sports and so on also gradually entered people's daily life. Marriage custom, funeral customs, festival and so on, presented a civilized fash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retains some traditional and backward customs. The social life changes of Jiaozuo is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doubl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 and intersection collision resul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style School, especially the establishment of Jiaozuo mineral school, making a larg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gather in Jiaozuo, added to the city's cultural atmosphere.

At this time of Jiaozuo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ystem reconstruction in Jiaozuo area from late Qing Dynasty to the founding of social life details, there are issues related to Jiaozuo people living state research to make up for this perio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Jiaozuo " *the rising of cit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y history.

**KEY WORDS:**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Jiaozuo ;Industrial revolution;Changes in social life

#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目 录.....	V
绪 论.....	1
第一章 从生态、行政到经济：焦作社会生活变迁的背景.....	7
1.1 焦作地区的生态.....	7
1.2 焦作地区的经济结构.....	8
1.3 焦作地区的行政建制沿革.....	11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焦作居民的生活与消费.....	13
2.1 服饰.....	13
2.2 饮食.....	16
2.3 居住.....	20
2.4 行止.....	23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焦作居民的信仰和风尚.....	27
3.1 休闲娱乐.....	27
3.2 宗教信仰.....	29
3.3 风俗习尚.....	32
第四章 因煤而变：对焦作地区社会生活变迁的思考.....	43
4.1 人口结构.....	43
4.2 现代城市设施的建立.....	45
结语.....	47
参考文献.....	49
致 谢.....	53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55
独 创 性 声 明.....	57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57

## 绪 论

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历史性变革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新旧因素俱在，中西文化交汇，传统与现代混同，出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强烈变迁。生活环境的变化，使得人们的生活也随之改变，并呈现出一些现代气息。作为社会重要的一部分，社会生活在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综合体现着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变化。

### 一、选题背景及其研究概况

社会生活史是史学研究的新热点，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会生活，作为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领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指人类整个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狭义指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公共活动领域以外的社会日常生活。随着社会生活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深入，各种丰富多彩研究成果的涌现，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史研究的风貌。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表层政治事件的抽象分析，历史人物的主观评价，民族关系的简单论述，由专题的个体考察，转为全方位的群体考察，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

1986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了以社会史研究为主题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标志着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始。此后不断有关于学科理论的文章问世，众多学者对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形成各种学术风格，诞生了一批学术理论论著。

常建华在其《漫谈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社会生活的研究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另针对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服饰、饮食、居住等进行了从古到今的论述。<sup>①</sup>彭卫认为研究社会生活史应该融会贯通多种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提倡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才能保证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科学认识。<sup>②</sup>

近年来，国内学界在社会生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涉及近代时期社会生活的综论性著作主要有：乔志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它是整体社会史学科体

<sup>①</sup> 常建华：《漫谈中国社会生活史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91年第8期。

<sup>②</sup> 彭卫：《略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系初步形成的标志，它填补了史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有功於学林。<sup>①</sup>之后，乔先生又和行龙主编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一书，此书涉及范围广泛，构架新颖，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阶层结构等社会构成，到物质生活、生活消费、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社会运行，再到农村基层政权、地方自治等社会功能以及近代华北灾荒、陋俗等社会问题，几乎无不涉猎。<sup>②</sup>

社会生活史是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然而民国，尤其是新中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一直未有系统的专著面世。严昌洪教授的新著《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填补了该研究领域的空白。作者从探究社会生活及变迁的视角出发，以专题的形式对20世纪百年来的服饰潮流、饮食文化、居住条件、交通设施、婚姻礼俗等逐一解读诠释，并进一步分析其社会变迁规律。<sup>③</sup>

进入新世纪后，国内在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反思与探索。在理论方面，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一步细化，从整体走向个别，从抽象转变为具体。这些理论研究成果与学术著述在研究方法和撰写方式上对本文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吴宏岐撰文对区域社会生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主要讨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内容，以及与社会史研究之间的关系。<sup>④</sup>雒有仓认为中国社会生活史主要应包括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社会群体及其行为特征、家庭生活及衣食住行变迁、社会教育与社会交往、生活的态度与价值观念等五个方面的内容。<sup>⑤</sup>

近年来，社会生活史研究除了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之外，很多学者也更倾向于区域社会生活史、服饰、民俗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饶明奇、祝军在《论近现代华北农村饮食的变迁》一文中认为，在近现代以来的华北农村，人们的饮食领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归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结果。社会风俗在转化过程中，通常表现出新旧并存现象，并且常会遭到迟滞保守历史惰性的阻挠。<sup>⑥</sup>有些陋俗保留了下来，甚至变本加厉形成一种逆反势力，焦静宜在文中分析了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守旧观念是破旧立新的思

<sup>①</sup> 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sup>②</sup> 乔志强，行龙：《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sup>③</sup>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sup>④</sup> 吴宏岐：《区域社会生活史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sup>⑤</sup> 雒有仓：《关于中国社会生活史的体系问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sup>⑥</sup> 饶明奇，祝军：《论近现代华北农村饮食的变迁》，《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想障碍，习惯势力是移风易俗的社会阻力，落后的生产力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使迷信活动历久不衰，而新生的腐化现象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催化剂。<sup>①</sup>陈珂对豫北近代豫北地区也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豫北近代社会风气是理学传统的与时俱进，经商风气初兴，随之社会腐朽风气也滋生出来，同时民族主义随社会情势高涨。<sup>②</sup>

严昌洪在《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一文指出：五四运动对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批以改造中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把目光下移，用各种方式向民众宣传移风易俗的道理，促进了社会风俗的转移。<sup>③</sup>徐永志在《晚清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演变》中认为太平天国运动、西方近代婚姻家庭观念的引入与传播，以及资产阶级新婚家庭观念影响了晚清婚姻观和家庭观的演进，促进了中国近代意义的婚姻家庭的产生。但是晚清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演变史是曲折的，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剖析。<sup>④</sup>

关于焦作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修武县志》、《孟县志》等今天焦作所辖的几个县志中，丰富的记载了该区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焦作文史资料》、《修武文史资料》等资料对焦作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进行了部分的整理。这些论著虽然是资料的汇编和整体的概述，但是为从总体上把握清末民初焦作民众生活的概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具体而言，国内外相关焦作地区社会生活的研究成果不多，主要存在于河南地方史研究专著和综合性研究著作中的相关部分以及相关研究论文中。

河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纂的《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主要搜集从1898年焦作煤矿建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有关焦作煤矿工人运动资料，可作为近现代史工作者的参考。全书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焦作煤矿的概况以及早期工人成长的概况；第二部分为反映我党和工会在焦作煤矿建立组织、开展运动的有关资料；第三部分是路矿当局与军政当局的来往函电、报告等；第四部分是关于焦作煤矿工人运动的论述和主要当事人的回忆；第五部分是焦作煤矿史大事记年。<sup>⑤</sup>

薛毅的《英国福公司在中国》，系统全面地论述了福公司从创立、发展以至走向衰败的过程；记叙了福公司在华独办、与中方合营各个时期政治、经济、外交活动的历史；反映了福公司给当地的社会、经济、人口、风俗等带来的畸形变化和种种矛盾。<sup>⑥</sup>王守

<sup>①</sup> 焦静宜：《浅析民初华北农村社会习俗变化中的逆向势力》，《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sup>②</sup> 陈珂：《豫北近代社会风气考略》，《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3期。

<sup>③</sup> 严昌洪：《五四运动与社会风俗变迁》，《华中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

<sup>④</sup> 徐永志：《晚清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演变》，《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sup>⑤</sup> 河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sup>⑥</sup> 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谦的《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一书主要从官方和企业档案、近代报刊、日记、地方志、当事人的回忆等史料为参考，坚持论从史书，对晚清至民国 40 余年来的福公司矿案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梳理与描述。<sup>①</sup>薛世孝的《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论述了近代以来煤矿工人从产生到发展成熟的经过，详细说明了当时矿工的悲惨生活。<sup>②</sup>

有关近代焦作研究的主要专题论文如下：王敬平在《英商福公司与焦作近代煤炭城市的形成》一文中记述了福公司对焦作近代城市形成的影响。<sup>③</sup>程峰介绍了道清铁路的修筑过程，并认为铁路的修筑虽是帝国主义为了掠夺矿产资源，但铁路的修筑也促进了沿线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改善。<sup>④</sup>岁有生，张雷对道清铁路给沿线经济的作用进行了阐述，认为道清铁路是英商福公司为了便于对河南省煤炭资源的掠夺而修筑的，但铁路出现之后，对沿线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促进当地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由传统向近代变迁的重要因素。<sup>⑤</sup>马义平以道清铁路与豫北城镇化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铁路在豫北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地位进行考察，揭示近代铁路与豫北地区城镇化进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及主要特征。<sup>⑥</sup>

除了上述的研究之外，有关焦作城市化进程研究的有两篇硕士论文。郭小雨的硕士学位论文《怀庆府中心城市演变研究（1368-1949）》谈及了明清时期怀庆府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焦作依靠煤炭发展起来之后，成为怀庆府地区的中心城市，改变了以往的格局，随之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也发生了转移。<sup>⑦</sup>齐新民的《焦作煤矿与焦作近代城市化》，以焦作煤矿与焦作城市近代化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主要论及了煤矿的开采对焦作城市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变迁的影响，分析了两者的内在联系。<sup>⑧</sup>

综上所述，对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学界已经出现了很多可喜的成果。但是，就区域史研究而言，这些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以来的一些大城市和通商口岸，对内陆地区城市的研究还很不足。另外关于焦作社会生活研究的不多，并且都是零散进行的。鉴于此，本文主要从近代焦作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入手，以求完整的再现当时风土民情。

<sup>①</sup> 王守谦：《煤炭与政治 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sup>②</sup> 薛世孝：《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sup>③</sup> 王敬平：《英商福公司与焦作近代煤炭城市的形成》，《焦作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sup>④</sup> 程峰：《道清铁路始末》，《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sup>⑤</sup> 岁有生，张雷：《论道清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的影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

<sup>⑥</sup> 马义平：《道清铁路与豫北地区城镇体系变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6期。

<sup>⑦</sup> 郭小雨：《怀庆府中心城市演变研究（1368-1949）》，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

<sup>⑧</sup> 齐新民：《焦作煤矿与焦作近代城市化》，西南交通大学硕士论文，1999年。

## 二、本文研究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通过各种文献史料的使用,细致梳理“焦作地区近代社会生活变迁”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从而呈现出因矿而兴的焦作市在近代城市化嬗变中居民社会生活方面发展变迁的整个图景,以求对以往研究本课题的不足问题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补充。这是本课题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写作宗旨之一。

至于论文中研究的难点,主要是整体布局的困难,社会生活史是研究历史上人们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现象和内在规律的专门史。它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饮食、服饰、居住、出行、娱乐和风俗。在整理材料时既要突出文章的重点,又要考虑各方面的平衡性,这点不好把握。另外,由于社会生活涵盖的内容比较多,史料收集完整有些困难。

本文将全面梳理焦作地区(1898-1949),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及其变化现象,以整个这段时间焦作市及其周边县人们的社会生活变迁为研究对象,进行长时段研究,系统再现焦作地区居民社会生活的原貌与变迁的历史轨迹。目前为止,以往对焦作地区社会生活的研究比较零散,还没有对焦作地区的社会生活史作全面和系统介绍的论文和书籍,本论文将弥补这一缺陷,这也是本论文的意义所在。本选题以社会生活为视角,对焦作地区社会生活进行初步考察,凸显了民众的主体性。

##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城市地理学、心理学以及人口学等多学科的理论,采用宏观的视角,主要运用以地方志为基本参考史料的文献法来进行论文的写作,力图直观、鲜活的再现当时的历史人物风貌和社会生活,并探寻近代焦作城市化进程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对焦作地区社会生活进行较为客观细致的分析,更为准确地把握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做出相对客观的历史结论。

此外,笔者还尽可能运用实地社会调查的方法以及一些其他常用的分析方法,如动态分析法和静态分析法等,尽可能做到相关方法的综合、有机的运用。当然,由于对焦作地区社会生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限于笔者能力、认识水平和对于资料占有方面的局限,在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有待今后不断地改进和深化。

此页不缺内容

## 第一章 从生态、行政到经济：焦作社会生活变迁的背景

### 1.1 焦作地区的生态

焦作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南麓，南邻黄河，地处北纬  $35^{\circ} 10' \sim 35^{\circ} 21'$ ，东经  $113^{\circ} 4' \sim 113^{\circ} 26'$  之间。辖修武、武陟、博爱、沁阳、温县、孟县、济源七县和解放区、中站区、马村区、郊区四区。因辖区范围形似一支牛犄角，被称为“牛角川”。焦作行政区域，地势北高南低，地形变化较大，地貌类型多样，整个地貌由低山、丘陵、坡岗、平原四个部分组成，海拔在 85-940 米之间，地势由西北向东南递降，层次分明，地形各异。北部为山区，南部为沁、黄河冲积平原。其中，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33.3%，丘陵面积占 10.6%，平原面积占 56.1%。平原海拔 80 米，丘陵海拔 200 米，山区海拔 1400 米。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季较短多大风干燥，秋季较短。雨热同期，降水季节分配很不均匀，全年降水量 80%集中在夏季 6、7、8 三个月，期间常伴有暴雨。焦作北部山区，雨季多发泥石流、山洪等灾害。晚清河南受全球气候异常的影响，导致灾害频发，焦作一带主要的灾害有旱灾、涝灾等。

光绪二年至四年（1876 年—1878 年）大灾荒是以大旱拉开帷幕的，由于这次大旱以 1877 年、1878 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这次灾荒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东至长垣，西至长安，南至汝州，北至太原，十分之中留二三”<sup>①</sup>。河南灾情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彰德、卫辉、怀庆三府，旱情更为严峻。怀庆府所属的修武、济源一带受灾尤为严重，河南巡抚李庆翱在光绪三年（1877 年）的上奏中称：“目前以开封、河南、彰德、卫辉、怀庆等五府情形较重，而怀庆府属之济源、原武，卫辉府之汲县、淇县，沟渠俱涸，被旱尤甚”<sup>②</sup>。对河南灾区进行义赈的江浙绅商也有此描述：“据述本年（光绪三年）豫省歉收者五十余州县，全荒者二十八州县，若怀庆府所属之济源，卫辉府所属之获嘉，陕州所属之灵宝，河南所属之孟津及原武、阳武、修武等县，接连旱三年，尤为偏重”<sup>③</sup>。济源坡头乡翟圪塔村碑记：自古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固未有如光绪三年之甚者也。大旱三年载，终岁未

<sup>①</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修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修武文史资料 第 9 辑》，1993 年，第 38 页。

<sup>②</sup> 《河南巡抚李庆翱折》，《申报》，1877 年 9 月 30 日，第 5 版。

<sup>③</sup> 《豫省来书劝赈启》，《申报》，1878 年 1 月 11 日，第 4 版。

登一粒，赤地千里，仓箱尽属空虚。斗米千八，价同珠玉，斤菜七十，人食草木。<sup>①</sup>修武地区最严重，从春至冬，当年基本无雨，庄稼种不进，长不出，树木落叶干枯，野外青草枯死。庄稼全年绝收，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五里源乡西板桥村留下的光绪三年荒岁碑记载：“欲卖田园，每亩价作百文，欲拆房屋，每间钱值数十。况五谷价皆轩昂：米麦每斗清钱一千六百二十文，高粱一千三百五十文，玉子一千四百五十文。”<sup>②</sup>人们只能以榆树皮充饥，连草根也挖的几乎不剩，甚至出现了“人相食，在河北者修（修武）为剧”<sup>③</sup>，人心惶惶。

民国期间，焦作的旱灾总趋势与河南省的通体情况基本吻合，“豫省自民九以还，灾浸迭见。然皆一时一地，全省元气犹未大损。最近十六七八三载，几乎无县无灾，不过畸轻畸重，略见等差。”<sup>④</sup>民国九年（1920年）大旱灾，济源县灾情极惨，“树皮草根均已吃尽，现在粮绝疫发，死者约五千余人，尸体遍野，豺狼满道，几成禽兽世界”<sup>⑤</sup>。武陟县因“久旱歉收，人情惶惶”<sup>⑥</sup>。

“大旱之后必有大涝，大涝之后必有大旱”，水灾也是焦作地区经常出现的灾害。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决口，“豫省下游被水者十五州县，待赈者一百八九十万”<sup>⑦</sup>，加之武陟县沁河决口，使得六十余村庄淹没。光绪十五年七月，怀庆府大雨倾盆，通宵达旦，河内县都庄和王贺庄交界处，数十年来并未生工，河水陡涨，以致漫溢。秋禾不无淹没，人口幸未损伤，维贫乏小户，不免荡析离居。<sup>⑧</sup>

## 1.2 焦作地区的经济结构

焦作煤炭开采历史悠久，《山海经》的《五藏山经》中指出，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有“贲闻之山（指焦作一带），其上多苍玉，其中黄垚，多涅石”<sup>⑨</sup>的记载。据有关专家考证“贲闻之山”即指的是今天焦作一带的太行山脉，“涅石”指的是煤炭。宋朝时，煤炭就成为这一带手工作坊的上等燃料。元代土窑已经相当普遍，元朝

<sup>①</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济源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济源文史资料 第1辑》，1991年，第159页。

<sup>②</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修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修武文史资料 第9辑》，1993年，第36页。

<sup>③</sup> 萧国桢纂：《修武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561页。

<sup>④</sup> 河南省旅务会编《河南省各县灾情状况·豫灾弃言》，1929年8月。

<sup>⑤</sup> 《晨报》，1920年9月19日。

<sup>⑥</sup> 史延寿修，王士杰纂：（民国）《续武陟县志》卷24《志余》。

<sup>⑦</sup> 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25页。

<sup>⑧</sup> 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75页。

<sup>⑨</sup> [晋]郭璞注、[清]毕沅校，《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1页。

国子监祭酒许衡告老还乡，他对当时焦作李封村的采煤业有“卧牛之地，日进斗金”的感慨。明朝煤炭开采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民间和手工业对煤炭的利用更为广泛，清朝小煤窑星罗棋布，从事采煤的工人已逾万名。

据史料记载，当时开采土窑多属于自发性质。农闲季节，社会上一些中下层人士自发组织起来，多则十几人，少则八九个人，以人入股，成立人份窑，又称为饭罐窑，他们既不开工资，也不起伙，每个人都是由家属在饭点提着饭罐送饭。他们采出来的煤，或以物换物（多是换来一些生活必需品，如粮食、蔬菜等），或是卖给商人转售。

从济源到林县太行山一带，“土薄石厚，中富煤炭，质精良。沿山居民，以采掘为业，千百年穿井数十，工人累百千，辘轳上下，人畜转输，手工时代，斯为巨业”<sup>①</sup>。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对河内、修武一带的煤炭进行了考察，并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当地土窑开采的盛况，“煤区东起修武，西达济源，中心为清化镇”。清化共有矿坑十个，每坑每天出煤 1000 筐，约 120000~130000 斤。

焦作地区多山地，农业条件相对落后，加之河南自晚清以来，自然灾害频发，当地农民多在农闲时节挖煤以赚取必要的生活费用。这些客观条件造就了小矿业在当地产业机构中的主导地位，使得矿工生计的好坏与当地矿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庙河、桶张河、马村、李河一带，土煤窑很多，成为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沿山一带灾情又比较严重，民不聊生，老百姓全靠挖煤渡荒。<sup>②</sup>“沿太行一带，人稠地狭，菽粟不足，以活人百万黔首缩赖为一线生计者，惟兹煤矿耳。”<sup>③</sup>

19 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尤其是中国在甲午战争的落败，帝国主义取得了在中国开矿设厂的权利。此后，各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设厂、修铁路、开矿，掀起了第一次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于 1898 年，通过外交手段和强权取得了在怀庆府治内开采煤矿的权利。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福公司总董哲美森、矿师利德来到焦作，在修武县老牛河附近的下白作村购民地 20 亩，建设矿厂，并以哲美森的名字命名为“哲美森厂”，又译为“泽煤盛厂”，<sup>④</sup>成为福公司在河南最早的开矿基地。

光绪三十年（1904 年），福公司正式开采之后，吸引了大批难民前来做工，当时的

<sup>①</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 第 28 辑》，1988 年，第 30 页。

<sup>②</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焦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焦作文史资料 第 3 辑》，1990 年，第 31 页。

<sup>③</sup> 《豫北矿务交涉始末记》（民国石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8 年，第 3 页。

<sup>④</sup> 萧国桢：《修武县志》民国 20 年铅印本，卷十一《交涉》。

《捷报》有所报导：“（福公司的）工厂、矿山和铁路雇佣了三千中国工人，此外，还有二十五名欧洲技师，矿区占地一千亩，并已修筑了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是苦力的茅屋和销售中国人通常使用的奢侈品的商店，包括澡塘、理发店和按摩院。”<sup>①</sup>我们可以由此看到焦作城镇化正在启动。据《东方杂志》记载：河南漳（德）、卫（辉）、怀（庆）三府，遍地山煤，居民每多合伙挖井采煤，行销山东、直隶、山西等省，以为生计，业煤之人不下 20 万人。<sup>②</sup>由于煤矿工人的增多，商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哲美森街已经有百货店、布店、饭庄、粮坊、日用杂货以及修配服务业等数十家。道清铁路通车后，晋、冀商人陆续来到焦作，并将京津杂货、苏杭绸缎运来焦作，同时日本的丝绸、百货业挤进焦作市场。<sup>③</sup>到民国十一年（1922 年），焦作的中山街（后东马市街，今新华街）基本形成，和西马市街、斜街（今生产街）、粮坊街（今和平街）相对应，形成商业市场，“变农业区域之旧观而为较繁盛的工业市镇”<sup>④</sup>。“焦作繁盛街市集于中山东街（今新华街），所有银行、绸缎、洋广布匹、饭馆、浴堂、妓寮、旅馆，均集于是……其著名之商号如钱业之同和裕，煤油业之聚源棧、中裕存，杂货业之德兴厚、德源恒，洋货业之义盛永、豫立丰，南货茶业之稻香村、紫岩春等”<sup>⑤</sup>。铁路在促进商业繁荣的同时也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结构的改变，出现了农业、工业并存的局面。修武县城居民两万人，“平时米市最盛，布市次之。近因福中公司采运煤炭，而钱行形发达。”<sup>⑥</sup>该县因煤炭开采而发展起了金融资本。

在民国六七年间（1917 年—1918 年），为焦作镇最繁荣时期，“地利开发，工商发达，与时俱进，俨然为豫省西北之重镇”<sup>⑦</sup>。据民国时期编写的《道清铁路旅行指南》对焦作的记载：“笙歌彻夜，其乐升平……所有四乡特产咸会于此，以备各地采购者；而津沪地之运销无烟煤者，莫不派员驻此采办。”“街市上亦进步很多，在中山大街有华丽的商店，平整的马路；交通汽车、马车、洋车。在此做事的、谋业的、做商人的各省人皆有，而尤以天津人为最多。因此，地方的面积虽小，而人烟稠密；并且在马路上常可看到相偕着三三两两的外国人，英国人居多。”<sup>⑧</sup>据道清铁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十多

<sup>①</sup> 《北华捷报》，1904 年 12 月 30 日。

<sup>②</sup> 《记事》，《东方杂志》，1909 年第 7 期。

<sup>③</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焦作文史资料（第三辑）》，1990 年，第 149 页。

<sup>④</sup> 《河南焦作的民众》，刊名《向导》，1926 年，第 1649-1650 页。

<sup>⑤</sup> 李燕：《道清铁路旅行指南》，铅印本，1933 年。

<sup>⑥</sup>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北京：武学书馆，1920 年，第 222 页。

<sup>⑦</sup> 李燕：《道清铁路旅行指南》，铅印本，1933 年，第 74 页。

<sup>⑧</sup> 艾新斋：《焦作的社会现象（河南通讯）》，《新人》，1934 年第 13 期。

年间减价发售到焦作火车五等车票票据的统计，外地人口到焦作务工的主要是煤矿矿工，1921年为100人，1925年为850人，另外不乏有经商、定居者等。通过乘坐道清铁路火车到焦作的人数，至1928年民国政府完成中国内地铁路网基本统一接轨时，已经增加1500人，1931年则猛增到2.2万人；随着道清铁路运输能力的提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5月，这一数据为3.5万人。<sup>①</sup>

### 1.3 焦作地区的行政建制沿革

焦作地区位于黄河中游，历史悠久，《禹贡》称“覃怀底绩”，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明清时期属于怀庆府所辖，下辖河内县（今焦作沁阳市和博爱）、济源（今河南济源市）、孟县（今焦作孟州）、温县（今焦作温县）、武陟（今焦作武陟）、修武县（今焦作修武）六县。清代又割开封府之阳武、原武二县来属，虽辖区有所扩大，但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其主体区域不变，南临黄河，北界太行山，西至王屋山，东达今新乡获嘉县一带。怀庆府治河内（今焦作沁阳）成为明清数百年焦作地区的中心城市。而“焦作”之名，最早出现于元代许衡著的《鲁斋遗书》中。焦作的前身是西焦作、东焦作两个自然村，古称“涧西屯”、“涧东屯”。据明万历四十年（1613年）《重修玉皇庙记》碑记载：宁（今修武县）治西北40余里有村曰涧西，即指现在的焦作街（俗称西焦作）。关于焦作地名的由来主要有以下说法。一种说法是由焦家作坊简化而来，在焦作一带的地名中，以带“作”字和“河”字的居多，民间曾经有“九作十八河”的俗语，说明这里的小作坊比较多。而焦作即为焦姓开的作坊，因为生意兴隆，大家在言谈中为方便而将之简称为焦作。焦作直到19世纪末期，还只是怀庆府下修武县管辖一个偏远小村。自英商开始在这一带开矿设厂，开采煤炭，焦作依靠自身的优势和有利条件迅速发展起来。

宣统二年（1910年），以西焦作为中心建立焦作镇，隶属修武县辖。民国二年（1913年），河内县改为沁阳县。民国十六年（1927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河南省主席时，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自由、平等、民权、博爱”建国大纲为名，在河南先后设立了自由、平等、民权、博爱四个新县。博爱县是在沁阳的辖区内划分出来的，当时各县均属河南省第四行政督察公署。1945年，建置焦作市（后改为县、矿区）。1948年8月，平原省成立，属平原省新乡专员公署领导。

<sup>①</sup> 陈康：《道清铁路对焦作近代社会经济影响初探》，《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此页不缺内容

## 第二章 晚清民国时期焦作居民的生活与消费

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吸纳，往往开始于最表面的生活习尚层次。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也是从衣食住行开始的<sup>①</sup>。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也最能直观反映社会的变迁。分析清末民初焦作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状况，有助于探求如今的焦作市所辖地区，在社会巨变中的生活形态的变迁。

### 2.1 服饰

服饰不仅具有抵御风寒、装饰的作用，同时也是人们身份、地位的表征，因而中国人就形成了“衣冠取人”的心理意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来华人数逐渐增多，沿海地区的人们和留学生群体，深受西方文化和生活的影响，尤其那些“先进分子”便日益走上了西化的道路。但对于交通闭塞、经济落后、风气未开的豫北地区，尽管也捕捉到了些许西洋文明，但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附和，相对于沿海、开埠城市西式服饰的潮流，豫北地区则显得相当迟滞，仍然保留着旧有的服饰特色。

清朝末年，无论男女老幼，衣服颜色均以青、蓝、黑三色为主。从衣服款式来看，男性不论长衫短袄，内衬外罩，一般都是大襟。富者以长衫为礼服，出门作客，外加马褂，以示庄重<sup>②</sup>。劳动人民的衣着多用粗布或紫花布织成。男式上衣多是对襟布衫，下身为大档裤；女式衣服以掩襟最为普遍<sup>③</sup>。穿长袍、马褂、长衫者，多为富家子弟。衣料贫富殊异，在当地布衣最为通行，通常农家之衣服，大都系由蓝色厚布所制成。夏日衣服并无条纹，冬日常衣绝厚之棉袄<sup>④</sup>。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使得“中产之家，终岁衣服不待外求，取诸室中而自足，各县大抵皆然。惟城市绅商及富家世族，其衣物乃有丝织品耳。北方风多，较寒冷，常见收麦时犹有戴毡帽者。其棉袄、棉裤之厚，皆为南数县人所不敢望”<sup>⑤</sup>。孟县商民仍多服长袍，衣料上崇尚土布，极富厚之家有哈喇、羽毛、

<sup>①</sup>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页。

<sup>②</sup> 何王芳：《民国时期杭州城市社会生活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sup>③</sup> 李英芳：《博爱县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sup>④</sup> 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30页。

<sup>⑤</sup> 刘景向总纂，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新志 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2页。

茧绸，男子亲迎仅制斜纹布袍褂<sup>①</sup>。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大批外国洋货输入和中国近代工业产品的增加，洋货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甲午战争后，步洋务派后尘，民族资本的机器纺织工厂在各地纷纷建立，新式机织衣料进一步冲击传统服饰。焦作地区也不甘示弱，当地士绅李靖潮模仿直隶高阳铁机办法，组织光裕工厂，竭力提倡使用铁织布机，将工厂由临颖迁至孟县，“代客承买铁机，四八（宽一尺一寸，长四丈八尺）等布，四乡机户曰多，据民国调查，县内铁机达五千余，每日出布可六、七千匹。倘能逐渐推广，人民生计当大有裨益”<sup>②</sup>。以往梭布每匹仅售三四百文，机器所织四八布则每匹可售两圆左右，与以往相比可获利二十余倍。另外，李靖潮还开设蒸房，仿山西做法酿造蒸酒，但是因水泉不佳，最终只能停办。温县地区也有记载，自从使用铁机“一人一日可出布数匹，较之土机数日而出一匹者，工本既省，获利自多”<sup>③</sup>。武陟县鲁连城在木栾店西创设纱厂，资本钜万，机器精巧为武陟商界开一新纪元，当必能抵制外货，挽回利权<sup>④</sup>。这就使得进入20世纪之后，近代工业产品在各级市场中，随处可见。据民国各县社会调查资料，修武县每年销售以布匹、绸缎、杂粮、棉纱为大宗，至大部分商品之来源，以外国货为多，英日占十分之七八，以售与农民及公司职员<sup>⑤</sup>。外国货大量充斥着市场，以修武城内最大的商号“瑞兴恒”为例，这家商铺大量经营颜料，以供人们自己染布，后来扩大生意增售日常生活用品，如针线、脂、粉、青禹州布等。如美商的美孚公司煤油，南洋群岛兄弟烟草公司的雪茄、翠鸟香烟、日商的大刀牌、双刀牌、哈德门香烟，北京德瑞堂的郝氏养肺丸，定县的白敬字眼药，新乡同顺裕与道口聚顺恒的德国颜料等，在“瑞兴恒”都可以买到。<sup>⑥</sup>焦作和道口的商号更加多，除了经营生活必需品外，更有京广杂货、丝绸、化妆品、银楼、照相生活奢侈品，这些都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沁阳县城和柏香、崇义、西万、西向等大镇，较大的商号有俊大、益兴永、祥兴恒、兰华馨、新华楼、联怡长等，主要经营绸缎、布匹、百货和金银首饰。

到了民国二三十年代，男子穿西装和中山装得到了社会认同，不仅留学生、官员、知识分子喜欢穿，而且其他阶层有条件的也以这样的穿着为时尚。“穿西装、戴礼帽、

<sup>①</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②</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③</sup> 民国《续修温县志》卷三。

<sup>④</sup>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卷六，《食货志》，民国二十年刊本。

<sup>⑤</sup> 《各县社会调查 修武》，《修武文史资料》第4辑，第82页。

<sup>⑥</sup> 牛建功：《牛家小店铺》，《修武文史资料》第4辑，第36页。

脚踏大皮靴，眼架金丝腿墨镜”<sup>①</sup>，这是当时年轻人所追逐的时尚穿戴。士绅、官吏、知识分子开始穿中山装，戴眼镜，脚穿皮鞋，手上戴金戒指，拄文明棍，戴怀表。<sup>②</sup>女子开始穿齐膝黑色短裙，不系绑腿带。20年代以后，青年女子开始剪发，留齐耳剪发头。除了日常生活的衣着外，在当时人们婚礼嫁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服饰的时代变迁，下面是一则婚礼中的民谣：“猛抬头，往里望，看见新人的好嫁妆，檀木柜，牛皮箱，里边放的是好衣裳。丝绸呢，花锦缎，做出衣裳甚时派。礼服呢、二毛羔，还有紫鹏大皮袄，穿衣镜，梳妆台，方便新人好打扮，花露水，雪花膏，羊肚手巾水上漂。”<sup>③</sup>

光绪十九年（1893年），就有人指出：“洋布、洋纱……华民皆采购用，而中国之织奴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无论通都大邑，僻壤遐陬，衣大布者不过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已有十之八九。”<sup>④</sup>这种估计并不离谱，虽然焦作地区较之沿海地区受欧风美雨的影响不是那么立竿见影，但是到了民国时，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孟地无水田，西乡岭坡地专种棉花，近也有种美国棉者。近因洋靛盛行，土靛无人过问，而种蓝者绝迹矣。”<sup>⑤</sup>孟县农业以靛草为大宗，唐柏双歧材木甚古，畜牧则以羊群为最盛，用旧法消皮，制成羊皮袄及绒毡，四乡宜棉，岁收数万斤。<sup>⑥</sup>孟县地区棉花种植业由来已久，纺织业比较先进，但是同样受西方机器化的影响，导致了本地土靛无人问津的局面。洋布的盛行和本地机器纺织业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穿着衣料更加西化，“几难觅身无舶来品者，而绸缎衣服亦见其夥。鞋袜向多家制，近今洋袜丝履举足皆然，而家制之品用者寥寥矣。”<sup>⑦</sup>

焦作因煤炭的开采而兴起，作为经济结构中重要的一环，研究人们的穿着不得不关注众多的矿工。由于矿工们工资收入低微，社会地位低下，他们的生活简直不如牛马。下面几首歌谣可以反映焦作矿工的生活苦况：“矿工虽有身，下井就没魂。穿的补丁衣，好似原始人。窝头烂咸菜，肠子空半根。”<sup>⑧</sup>“万能衣，真出奇，冬天穿夏衣，井上当

<sup>①</sup> 王永川：《“金砖案”轰动全国》，《修武文史资料》第4辑，第64页。

<sup>②</sup> 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焦作市志》第3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1267页。

<sup>③</sup> 政协焦作市山阳区委员会编：《焦作市山阳区文史资料》第1辑，第175页。

<sup>④</sup>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纺织》。

<sup>⑤</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物产》，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⑥</sup>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第223页。

<sup>⑦</sup> 宋立梧等：《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⑧</sup> 翟作正：《中国歌谣集成·河南焦作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7页。

礼服，下井是窑衣，夜晚做被褥，也是好衬衣。”<sup>①</sup>这些歌谣形象地说明了一个矿工春夏秋冬，井上井下，白天黑夜只有一件衣服的可怜情景。

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十七日，政府公布新礼制，对警察服饰做了特别规定。男子礼服，分大礼服、常礼服两种。大礼服料用本国丝织品，长礼服又分甲乙二种，料用本国丝织品或棉织品、麻织品，色俱用黑。<sup>②</sup>冯玉祥初到河南时，就制止公务人员穿长袍短褂，在制服没规定以前，各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短衫上班，后来每人发给束袖口有腰带的列宁服一套，八角帽一顶。<sup>③</sup>后来规定：凡有公职者，俱服中山式制服，而袍褂式礼服，乃日见减少。<sup>④</sup>机关服务人员一律制服。

## 2.2 饮食

晚清民国时期，焦作一带人们的饮食以玉米、小麦、地瓜为主，杂以谷子、高粱、豆类（黄豆、绿豆、豌豆、红豆）、黍子等五谷杂粮。副食以蔬菜为主，肉类、蛋类过去是寻常人家办喜事和待客的珍品。多数贫苦民众，一日两餐，只有农忙时节才会一日三餐。贫苦民众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中产之家主要是小麦和其他五谷杂粮掺着食，富户终年以麦粉为主食。济源农产粟麦较多，稻米最少，农民终岁勤劳，不肉食，每日三餐多食谷米，麦饭最少，如无婚丧事故，稻米亦不多用。<sup>⑤</sup>

中国的农民向以节俭著称。节俭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传统，更主要的是出于实际生活环境的需求。中国农村的生活向来清苦，在近代豫北，小麦属于细粮，其食用价值超过其他粮食作物，价格相对较高，一般农民常将小麦运到市场出售，交换现金，希望能多卖几个钱，增加一点收入，另购玉米、高粱等粗粮作为日常食物。<sup>⑥</sup>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调查者张厚昌赴河南调查时即见豫北“农民将价格较昂之粮卖出，而自食者多用高粱，或以小米掺青菜作粥，或以菜豆磨粉作面条，煮为汤面”<sup>⑦</sup>。“新乡附近诸县，冬

<sup>①</sup> 薛毅：《焦作煤矿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8页。

<sup>②</sup> 刘景向总纂，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新志 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

<sup>③</sup> 段再丕：《冯玉祥主豫措施》，《河南文史资料》第8辑，第72页。

<sup>④</sup> 刘景向总纂，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新志 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4页。

<sup>⑤</sup> 《河南各县社会调查·济源》，《河南统计月报》第三卷第三期，1937年，第129页。

<sup>⑥</sup> 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sup>⑦</sup> 张厚昌：《豫省农民生活之所见》，陈伯庄编《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附录第44页。

日以蔓菁胡萝卜为重要食品者。”<sup>①</sup>太行山深处居民生活则更加贫苦，竟以树叶为主要食物，如榆、柳、杨、槐、杏、棠、梨等，取其花叶等部，煮熟浸渍之，即可食；或煮后晒干，贮藏备用，其多者若平原农民之藏米谷焉。<sup>②</sup>豫北乡村向以农为本，养鸡是农村的重要副业之一，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鸡。但是极端贫困的生活使得人们不舍得食用蛋禽之类，而是将养殖当成是一经济来源，鸡蛋往往拿到市场上换得口粮。

焦作地区人们喜吃面条、馒头，过节待客或是喜事，会特别重视饮食，而尤以富厚之家铺张。“商民多每日三餐。食料以蒸馍（古称炊饼）、面条（古称汤饼）、小米（古称黄粱）粥为大宗，下饭惟用菜蔬，且极简单。年节待客，普通备火锅、四盘，嫁娶盛设亦仅十碗席，不用海菜，极富厚者始用海参二味席。今则中人之家用海参，稍丰即用鱼翅四味。厨役工价则海参向仅每席百文，今则一二千文不等，至由馆中包办海参席，向仅每席一千余文，今则四五圆，亦可以观世变矣。”<sup>③</sup>

沁阳古为怀庆府治，商业发达、商贾云集，历来饮食服务业较为繁荣。清末民初，县城有三和楼、五福楼、大仙堂、怀庆饭庄等较大饭庄多处，小饭馆和小吃摊铺遍布各主要街道，风味小吃品种繁多，驰名远近。早茶早点有绿豆凉粉、米茶、油茶、粘糕、麻糖、油条、水煎包、肉盒、包子等；肉食品有咸驴肉、烧牛肉、咸兔肉、勒车肉、卤鸡等；面食品有锅盔、烧饼、扯面、削面、卤面、烩面、红面、浆面条等。还有牛肉丸、绿豆丸、元宵、杂碎等。1938年，日军侵占沁阳后，饮食服务业冷落下来。

武陟县城古称“木栾店”，当地聚居着一些回族，他们多以牧羊、宰羊、卖羊肉为生，平时吃得起羊肉的只有大户人家，贫穷百姓只能在“羊下水”上打主意，这也造就了武陟有名的羊杂碎生意。<sup>④</sup>焦作经济的发展，使得很多南方人前来做生意，武陟县一家有名的杂货铺——“东义和”，因为创办者是浙江人，店里除了销售自家制作的南方绍酒、南式点心、腐乳、陈醋等，还经营金华火腿、腊肉、香肠等外地特产。<sup>⑤</sup>南方食品的引入，丰富了人们的饮食。当然，焦作本地也有自己的特产，如当年，冯玉祥上山西路过清化城，前清翰林杜严（字友梅），宴请冯玉祥品尝地方风味小吃，在一张餐桌上摆了许多地方菜；有清化凉粉、贾氏卤鸡、拔丝山药、许良白玉壳、小葱拌豆腐、八

<sup>①</sup> 吴世勋：《分省地志——河南》，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第23页。

<sup>②</sup> 刘景向总纂，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新志（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sup>③</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④</sup> 鲁二根：《多种多样的羊杂套餐》，《焦作文史资料》第8辑，第181页。

<sup>⑤</sup> 黄炎明，刘宗宽：《东义和始末》，《武陟文史资料》第1辑，第133页。

街炒凉粉、西关小车牛肉等。<sup>①</sup>

光绪三十年（1904年），福公司在泽煤盛矿厂附近筑路建房，设立各种商店和按摩院，开辟焦作矿区生活区。福公司进入焦作之后，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丰富了当地的饮食结构。在东马市街、斜街（今生产街）戏院及矿井周围，摆摊设点，以经营经济实惠的大众饭菜为主，主要品种有面条、窝头、玉米面花卷馍、丸子、凉粉、稀饭、肉合、羊肉汤等。在焦作李河镇，出现了专营米麦杂粮的裕工粮坊，五美香主营盐、酱、酒、醋（东街），中福消费合作社主营油糖杂货（中山大街），四合肉架主营鲜肉（东街），中福公司主营煤炭（上厂），稻香村主营罐头食品（东街），华升号主营粗瓷、陶瓷（李河村），华美药房主营西药（西街），春和祥、春和堂主营国药饮片。<sup>②</sup>在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反动统治的勾结下，一批又一批的劳动人民破产失业，被抛入游民无产者行列。资本家又从他们之中收买廉价劳动力，从而榨取高额利润。福公司工人劳动强度大，但相应报酬极低，生活条件恶劣。工人连下饭的菜都买不起，只能吃又脏、又苦、又涩的烂萝卜，还常有人拾人家扔掉的菜叶子吃，省下的钱好养家糊口。夜里，矿工就睡在临时搭建的茅草棚子里，多数人睡觉从来没脱过衣服。民国十四年（1925年），焦作矿工大罢工，取得了一些权力，生活较前稍微富裕。工人食料，仍然以玉籽为大宗，麦子次之，月需四元之谱，衣料尽为洋粗布，全年约需洋十余元，故家累稍小者，均可维持。

③

此外，还有一些大饭店、酒楼、招待所为招揽生意，大多设有西餐厅。西餐开始日益走向市民的日常饮食生活中。但应该注意的是，该时期对西式餐饮的享受，往往局限于当时的中上阶层，而对于普通劳动大众来说，西餐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实，但他们也有他们追求西式饮食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往往是那些糖果、点心、罐头、汽水等价廉物美之物。另外，酷热的夏天，在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卖冰激凌的铺子，人们可以借此消暑。

日常饮食之外，每逢佳节，人们还自制或购买具有特殊意义的节令食品。阴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户户炸糖糕、麻糖，吃粽子的也不少，亲朋好友送礼，必有粽子，粽子多是买的，自家做的很少。粽子分枣粽子和糖粽子两种，主要原料是江米也叫糯米，

<sup>①</sup> 鲁二根：《多种多样的羊杂套餐》，《焦作文史资料》第8辑，第124页。

<sup>②</sup> 交通部邮政总局：《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河南编》，《工商行号调查（豫26）》，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sup>③</sup> 《本公司矿工里工工人生活状况》，《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第2期，1931年4月。

枣粽糯米加枣，糖粽糯米加糖，很少包豆沙的，更没有包咸肉的。<sup>①</sup>阴历八月十五日，过中秋节吃月饼，大都由糕饼店购来，由最大的五斤一个，最小的一两个，一整套由大到小有十几层，甚是壮观。馅大致以冰糖玫瑰和枣泥为多。另外家家户户都自蒸枣糕，用发面，擀成四十公分直径的圆饼，上面排满了红枣、栗子等，一层层的叠上去，叠三四层后，在面上用面捏制兔子捣臼的图形，代表月亮，然后入笼蒸熟，切开来吃，晚上用水果祭月。腊八，是过年的前奏。腊月初八的早饭，家家都以大米（或小米）、黄豆、花生、肉、豆腐、粉条、蔬菜等混合煮成咸粥吃。<sup>②</sup>

近代豫北地区频繁的自然灾害不容忽视，尤以旱灾为最厉害。如民国九年（1920年）大旱灾是清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之后豫北近代最严重的一次旱灾。据当时陕西旅京学生杨钟健观察：“由郑州顺京汉路线以北过了黄河，旱状更加厉害。卫辉、彰德一带，几乎莫秋禾可说，而且这一带麦秋也一点未收”<sup>③</sup>。“济源县灾情极惨，树皮草根均已吃尽，现在粮绝疫发，死者已尽万人，村落为墟，亘数十里不见人烟”。<sup>④</sup>豫西、豫北每日有五六千人冻饿而死，惨不忍睹。当时，生者所食之食品为畜类所不食。主要有：糠馍、麸馍、野菜糠馍、玉黍心（即包米棒，可作燃料）、杂树皮面、净石面（久食必死）等20多种。焦作四周的农民生活极苦，吃高粱小米者，在乡间还算是中等人家，而一般极贫苦之农人，竟有吃糟糠者。<sup>⑤</sup>

民国以来，军阀混战连年，豪绅盘剥苛重，据《温县社会调查》（1932年资料）载，温县人口192360人，耕地40万亩，夏粮亩产130斤，秋粮亩产170斤，每亩课税约为夏粮亩产的70%（约90斤左右），物价每元货币可购小麦25~30斤。温县怀地黄、山药品质优良，出产最多，温县城内设庄进行怀药交易的不下数十家，“近数年来，各项捐派，有加无已，商家因负担太多，纷纷歇业，而怀货庄至今竟无一存者”<sup>⑥</sup>。这就使得绝大多数民众常处于“五谷所入，丰难有余，歉则不足”的境地，农民家户多以精致木囤储粮，视粮食如金玉。农闲季节日食两餐，能够粗食三餐者，视为优裕享受。而无地无业的贫民，则常靠出卖劳力或乞讨维生，眷属老幼常年处于衣不蔽体、吃糠咽菜的

<sup>①</sup> 郭景道：《民风民俗——焦作一带的旧时礼俗》，《焦作市山阳区文史资料》第1辑，第180页。

<sup>②</sup> 李胜甫：《温县的风土习俗》，《温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101页。

<sup>③</sup> 杨钟健：《北四省灾区视察记》，《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

<sup>④</sup> 《豫境灾荒之惨象》，《申报》，1920年9月26日。

<sup>⑤</sup> 龚逸情：《河南焦作的民众》，《向导》，1926年7月28日。

<sup>⑥</sup> 段继武：《温县志稿》，1933年，第50页。

生活状态。<sup>①</sup>

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起，武陟县连年遭受水、旱、蝗、瘟疫灾害，兵祸也接踵而来。1943年春，旱灾仍在继续，赤地千里。黎民百姓食不果腹，以榆树皮、树叶、蒺藜、花生皮、野草充饥，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在饥寒交迫下，群众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弃婴及饿死者极多。据当时老人们说，比光绪时的“丁戊奇荒”还要厉害十倍。再加上当时日本侵略者对我国实行“三光”政策，日伪军、杂牌军队各据一方，收刮民膏，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食不果腹。老百姓遭此灾荒，除小康人家有余粮外，多数贫穷人家，本身自耕地不多，收麦子有限。往年全凭用五谷杂粮过日子，灾荒使得杂粮也断绝了。“饥不择食”，饿了人们不管什么都吃，当时人们所吃的（即非粮食的东西）如：花生叶干、花生皮、红薯秧、榆树皮、干菜等，磨成粉末，掺合部分五谷杂粮来充饥，甚至将蝗虫弄来煮吃或炒吃填满肚子。<sup>②</sup>由于蝗虫飞落各家各院，室内墙壁都爬着蝗虫，人们信手而得。天长日久，多数穷苦人，面黄肌瘦，有的得了浮肿病。

总体来说，人们的日常饮食没有太大的变化，交通的发展使得地区间的物产交流频繁，丰富了饮食。但是在军阀混战和灾害频发的时期，当地人们的生活环境出现了倒退，饮食质量也随之下降。

## 2.3 居住

房屋是人类抵御风寒和休息繁衍的场所，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活水平等的差异，我国各地居住类型、房屋样式、装饰陈设等方面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结构一般为木骨泥墙，木头是主体骨干，是承重的，墙壁“如皮肉之附在骨上”，这是中国建筑独有的特点。<sup>③</sup>当时的民居多为土坯（群众叫“胡砌”）墙，木梁檩结构，房顶订椽、铺簿、散瓦，工艺讲究，可数十年致百年不毁。穷苦劳动人民居住多为土木结构的狭小的屋子，有的还是草顶。还有少数农民连一间草顶房子也没有，终年过着串房檐生活。富裕人家住的是砖木结构的青砖瓦房，清洁明亮。也有的大富户，一连两三串院，前厅后楼、东西两厢房的四合院。济源平原村镇民宅均系四合

<sup>①</sup> 温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温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575页。

<sup>②</sup> 王守义：《修武地区蝗灾锁忆》，《焦作文史资料》第4辑，第4页。

<sup>③</sup> 耿光连：《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济南：济南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院且是瓦房居多，土木结构，极为讲究：房脊内习惯放五谷杂粮、笔墨纸砚、钱币等；房屋内向不取正南正北子午线；檩椽忌讳用桑木、柳木等，券门不压门墩；门窗讲究眉（门）高眼（窗眼）低，后墙不取窗户。济源山丘地区，农民多住窑洞，依堰筑就，冬暖夏凉，但是透光度差。在深山地区，民房多为草房。<sup>①</sup>黄河和沁河滩区，一般以木杆作架，顶苫草，墙为高粱杆绑扎糊泥（叫搭庵），以防止黄河泛滥，便于搬迁。<sup>②</sup>民国时期，一般农户仅有方桌、柳圈椅和木箱等。在太行山深处和济源地区，有一种特殊的民居，即窑洞。这种窑洞多系一面而围以墙，每院多正窑三五间，外面配有茅屋。贫困家庭建筑窑洞极为简单，住的是土窑；富人住的是砖窑。“前有门窗，内侧或只一室，或曲折作复室。贫者床、凳、桌、橱等，皆就自然之壁土斫成，富者于前面及内部，遍砌炼砖，修筑费有远过于建屋者。”<sup>③</sup>

清末民初时期，在博爱县上庄乡下庄村下秦河南，有一处别致的庄园。庄园主是曾在清朝政府历任过吏、户、礼、工、兵部尚书的毛昶熙，别墅座南面北，占地面积达十亩之多，院内假山、各种奇花异草，园内景观极佳，整体设计别致。<sup>④</sup>回民在博爱和沁阳地区居住比较集中，他们与汉民居住基本相同，回民经商的居多，经济发展较快，私人盖楼房的更多，有的装修得相当精致，居住条件改善更快。民国十八年孟县在新建设口号的影响下，城市商家门面开始用蓝油，但是建筑依然如故。由于县城人稠地狭，宅院多宽仅三间，其五间宽者平均不及十分之一。<sup>⑤</sup>总之，民居建筑因其耐久性，传统建筑的风格和用材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随着清末帝国主义侵华的加深，不仅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还进行文化侵略，大量传教士来华传教。焦作地区也逐渐出现了西式建筑。在小城镇里，教堂往往是当地最早的洋式建筑。如英国传教士在沁阳购地建恩赐医院、教堂。继英国之后，又有意大利、美国传教士来焦作传教，在县城东大街占用民宅，修建天主教堂和医疗诊所，<sup>⑥</sup>并在修武县城东南买地建了欧式小洋楼。<sup>⑦</sup>

随着福公司在焦作开矿设厂，采挖煤炭，河南最早的产业工人也伴随着大工业的诞

<sup>①</sup> 济源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济源市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89页。

<sup>②</sup> 温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温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00页。

<sup>③</sup> 刘景向总纂，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新志 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65页。

<sup>④</sup> 王中廉：《毛文达公别墅》，《博爱文史资料》第6辑，第102页。

<sup>⑤</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⑥</sup> 中共沁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沁阳历史 1919-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页。

<sup>⑦</sup> 李继陶：《西医药传入修武县城述略》，《修武文史资料》第4辑，第42页。

生而诞生。民国四年（1915年）福中总公司成立后，焦作煤矿工人已愈万名。到了1920年前后，焦作煤矿已有工人20200人，其中福公司9000人<sup>①</sup>，中原公司11200人<sup>②</sup>。大量工人和外国人来到焦作，就需要更多的房屋。砖瓦结构平房，多为高级职员和包工头居住。里工中除了少数眷属住自建房外，绝大多数靠租赁民房或自挖窑洞安身。外工则多数住窑洞。<sup>③</sup>而英国人的住宅，多为西式洋楼。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英商福公司在泽煤盛厂附近（现花园街南），为英人高级人员建起了第一座西式地楼住宅，面积190平方米。至1924年，福公司共建住宅面积6553平方米，其中，英人居住的达5189平方米，占79%。英人住宅多为西式地楼，面积大的有460多平方米，小的有120余平方米。地楼结构讲究，建筑面积大，使用面积小，楼内设有会客室、卧室、阅览室、浴室、厕所，有的还设舞厅、游艺室等。据有关记载，1925年，在焦作住的有三十多户英国人，他们雇佣很多中国人为之服务。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住房条件是非常优越的，如福公司秘书瑞尼士的住宅是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洋房。外边有凉台，走廊，里边有穿堂，会客室，餐室、书房、卧室、浴室、厨房和贮藏室。院子里有奇花异草，有专职花匠为他种植和修剪，一年四季可以赏花。紧靠他住宅后门的外边，有几间小平房，是供杂役住的。<sup>④</sup>

福公司办公建筑方面，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原焦作总机厂内建成“洋总管”兼车务总办公楼1座，共2层、20余间，建筑面积455平方米。是焦作最早的一座两层办公楼房。<sup>⑤</sup>英福公司总办事处办公房，建于1919年至1920年。房内地板和天花板用木条镶制油漆而成，室内设有壁炉。整个房体为砖木石结构，房顶用小青砖扣成。主房门正中设轿车行道，行道前建有圆形水池及假山，两侧配有花坛。此房样式别致，结构严谨，工艺精巧，为焦作20年代之精湛建筑。

1911年至1921年，焦作的福中大街、中原大街、东西马市街、盐店街等主要街道两侧建造的商店面铺，其外观多为洋式门面。各房门窗顶部及店房上沿，多将青砖磨制成园型和八字型、砌成凸形圈拱与各种造型的装饰门面。楼房和平房均为砖木结构。从整体样式而言。为“外洋内中”、“中洋结合”的商店建筑。1937年前后，往来焦作的

<sup>①</sup> 薛毅《焦作煤矿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sup>②</sup> 转引自薛毅《焦作煤矿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页。见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第106页。

<sup>③</sup> 焦作矿务局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焦作煤矿志1898-1985》，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31页。

<sup>④</sup> 中共焦作市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中共焦作党史资料选编 一、二战时期》，1986年，第138页。

<sup>⑤</sup> 赵尚兴：《焦作市建筑工程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旅客较多，焦作出现了较大的旅店，而这些旅店的外观设计和内部陈设都明显的具有西洋风格。

## 2.4 行止

焦作地区的地形以山地和平原为主，至于出售农副产品、购买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或经商、贸易、走亲，平原地区人们多步行，人力挑扛。也有用人力独轮小车推运，或畜力铁木马车拉运。走亲作客，贫民多徒步，富家多坐轿或马车。至于太行山一带的人们，出行更是靠走路，少数富户用驴、骡驮运或者雇人挑扛。走亲串友，一般民众多徒步，富厚之家多骑马，或者坐人力爬山虎。<sup>①</sup>在孟县地区，主要交通工具具有轿车、大车、铁脚车三种。但是轿车虽然便于乘坐，但终究只是少数富贵之家的出行代步工具。大车主要用于运载货物，后来人们在上面搭建篷子，方便乘坐。“脚踏车多用牛驾”<sup>②</sup>，但是我们知道，在农业社会，牛是重要的劳力，因此用牛拉车只是少数。传统运输工具主要有马车、毛驴车、独轮车、架子车、三轮车，这些传统的运输工具在河南尤其是乡村社会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家运输粮食、肥料、赶集运送货物等几乎都是用传统的运输工具，但是传统的运输工具也有所变化，如马车开始使用胶轮，出现了胶轮车。

19世纪末，自行车传入中国，并首先在通商口岸各大城市流行，但当时量少价贵，只有外国人、买办、商人、纨绔子弟才能买得起。进入20世纪，自行车开始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焦作很多青年学生、公务员也开始使用。孟县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时，“商民多购用自行车”<sup>③</sup>，据调查已有自行车五百余辆之多。人力车又名黄包车、东洋车，据传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由一名美国牧师发明于日本东京。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传入中国，由于人力车比西式马车简便、低廉，又比轿子方便，因此人力车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使用。如焦作政府人员接待省政府视察人员，也是“乘坐人力车到市党部”<sup>④</sup>。

传统代步工具，无论是轿子还是畜力车，自备之家需要有一定的财力，临时雇用也必须有一定的支付能力，因而只是中上层人家才可能日常享用，下层百姓一般只能骑驴、乘坐独轮车，更多的只能徒步。

<sup>①</sup> 李英芳：《博爱县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sup>②</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③</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④</sup> 河南省政府秘书处：《河南政治视察》，民国二十四年编印，第87页。

交通工具是交通系统中的重要物质因素，是交通主体实现人、物、信息空间位移的手段，是运输的载体。<sup>①</sup>豫北地区位于华北内陆，铁路未兴之前进行的对外贸易交流主要依靠传统的驿运、水运等方式。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之后，近代工业化的增长及对外贸易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以铁路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构建。<sup>②</sup>

英国福公司为方便掠夺焦作地区矿产资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始修筑道清铁路，1906年开始营运，1907年全线通车。《道清铁路旅行指南》卷首《道清铁路略史》中有详细的记载：“本路发轫于道口，终止于清化，后复拓展至陈庄。沿线所经，昔为殷周之地，绵亘八县，横贯豫北。虽本线仅长一百五十公里，展线十三公里二五，合共一百六十三公里二五，实居历史上重要地位。”这条铁路横跨浚县、滑县、汲县、新乡、获嘉、修武、沁阳七县，福公司建筑道清铁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外运焦作煤炭，虽是帝国主义侵略性质，但与以往靠肩挑、驮运等方式运煤相比，显示了极大的优势。

焦作地区煤炭多为无烟煤，除了用于工业和交通以外，也是生活常用煤。冬春是用煤旺季，夏秋是销售淡季。道清铁路除了负责煤炭外运之外，多以粮食和其他作物为大宗，其运输旺淡季与中福煤炭相同。<sup>③</sup>为了充分利用铁路的闲置运力和方便物资的外运和交流，铁路管理局制定了一系列运输特价条例，方便物资的外货与交流，如民国二年（1912年），竹竿、竹器特价：凡是用三十吨车皮装运者，将按照二十吨计价；如果用二十吨车装运，则按照十五吨计算。<sup>④</sup>焦作境内较大的河流有黄河、沁河、丹河，在雨水充沛时节，河流也担任重要的航运功能。但由于丹河逐渐淤塞，“道清铁路成而航运遂废”<sup>⑤</sup>，显示出了铁路的优越性。京汉铁路，原称卢汉铁路，从武陟县境东南经过，由获嘉武陟接界之王庄北入境，在武陟县境内约二十八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通车，詹店及黄河北岸两处设站售票<sup>⑥</sup>。使得焦作地区广大腹地与华北华中联系更加紧密，人们也更方便北上或南下经商。武陟地区可谓是交通便利，不仅京汉铁路通过，而且自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开工至三十一年十月（1903年—1907年）修建了黄河铁桥，北起黄河北岸，南抵广武山麓，计一百零二空，每空长十丈合华里六里有奇，汽车往来极为便利。<sup>⑦</sup>突破了黄河的阻隔，这就方便了武陟和荥阳地区的交流。

<sup>①</sup> 谷中原：《交通社会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60页。

<sup>②</sup> 谷中原：《交通社会学》，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sup>③</sup> 王守谦：《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95页。

<sup>④</sup> 范予遂：《道清铁路运价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交通杂志》，民国二十三年，第二、三期合刊。

<sup>⑤</sup> 萧国楨：《修武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804页。

<sup>⑥</sup>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卷五，《交通》，民国二十年刊本。

<sup>⑦</sup>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卷五，《交通》，民国二十年刊本。

对于焦作这个内陆地区来说，具有影响力的现代交通工具除了火车外，就是汽车。自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福公司运来并使用一部褐色小轿车，焦作地区首次出现了汽车。汽车作为当时罕见的交通工具，受到了大家的青睐。汽车成为福公司上层人员和地方士绅的代步工具，除此之外，汽车更多的用途是装载货物。民国十九年（1930年），孟县的汽车仅限于“孟汜长途汽车公司借城南黄河堤东至温县汜水口试办装运客货”<sup>①</sup>，但因经营不善而停运。河南新乡专署在1933年以前还没有汽车，公路上行走的，只有铁轮大车和木轮车，公路上没有路面，只留下车轮压过的车辙，下雨天就变成了水泥路，人们行走都很困难。后由第四专员公署出面，官商合办“仲明汽车公司”，在上海买回四部美国造四缸“福特”汽车，当时只跑新乡——孟县、孟县——汜水口等线。<sup>②</sup>1945年，焦作第一次解放，太行四专区汽车站开辟了焦作至沁阳的班车线路，为隔日班车，夜宿日行，人满即走，不定时，不定点，客车由货车代替。

中国城市原来的街道狭窄，“人摩肩，车击毂”，固然是形容人多商业的繁华，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街道狭窄的一面。城市如此，何况广大不发达的小城镇和农村。河南第一条公路始于民国九年（1920年）华北大旱期间。旱灾发生后，华洋义赈会等慈善机构为了救济河南灾民，将清化镇至沁阳的原有的官道进行整修，改为汽车路，全长57.5公里。<sup>③</sup>华洋义赈会以工赈的方式在焦作修筑公路，就当时的救灾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带动了公路事业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出行。1921年，福公司开始在焦作镇修筑马路，当时称为汽车路，“自焦作起至博爱县李封村止”<sup>④</sup>。1922年，福公司中原公司在焦作镇修筑马路六道：（一）中山东街，由福公司南口起至铁路局止；（二）公安局街由福公司西墙外起至西营部街止；（三）中原大街由福中大街北头起至中山东街中段止；（四）福中大街由福公司东门外起至车站街止；（五）车站街由车站起至福中大街南头止；（六）中山西街由公安局街东头起至永宁街头北。1928年，中原公司监督汽车路一道，自焦作起至李河止。<sup>⑤</sup>1923年，温县第一条通行汽车的公路，温县至孟县公路以黄河大堤为路基修成通车。<sup>⑥</sup>截止到1935年，焦作地区最长与最宽的道路及其建筑情形如下：焦作至李河公路，长十余里，宽约四丈，系中原公司出资用新法修筑；获嘉至博爱

<sup>①</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八，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sup>②</sup> 李振国：《中国木炭汽车发明者——汤仲明》，《孟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73页。

<sup>③</sup> 程民生主编：《近代河南经济史（下）》，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7页。

<sup>④</sup> 萧国桢：《修武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804页。

<sup>⑤</sup> 萧国桢：《修武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804页。

<sup>⑥</sup> 温县志编纂委员会：《温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349页。

公路，长八十余里，宽三丈六尺，用旧法修筑，行人不便。<sup>①</sup>

---

<sup>①</sup> 《河南各县社会调查·修武》，《河南统计月报》，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第一卷第十二期。

## 第三章 晚清民国时期焦作居民的信仰和风尚

### 3.1 休闲娱乐

农村的娱乐活动总是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而在近代，娱乐活动的宗教色彩渐趋淡化，“或曰守神或曰还愿，实则人民娱乐之一种耳”<sup>①</sup>，娱乐活动是从宗教活动演化而来，而娱乐活动也是由宗教组织嬗变而来。各种娱乐活动是以敬神祈福为号召，从而达到物资交流和群众娱乐之目的。华北农村的娱乐活动主要是由庙会组织的，除此之外，农村还有秧歌会、灯会、火神会等娱乐组织。<sup>②</sup>晚清民国时期，焦作地区人口的增加和结构的多样化，为了适应人们的消费需求，市区逐渐出现了电影院、公园等现代城市娱乐场所。

庙会之所以盛行，在于农村缺乏娱乐活动。农民除了春种秋收、年节酬酢、烧香逛庙之外，没有其他的娱乐可言。明清庙会的发展，为人们的交往提供了新的良机和最佳场所。<sup>③</sup>富商大贾，云集与会。会上不仅有品种繁多的商品，而且通常伴随着表演节目，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丰富人们的生活。因此，庙会在农村娱乐活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赛神是民间的酬神活动，每逢节日都会有隆重的迎神赛会活动，沁阳县城东关火神庙的祭祀“火神”，历史悠久。另外，为了纪念我国大乐律家朱载堉，山王庄的张坡兴起了古庙会。迎神赛会，定期演戏等，以阴历元月为多，热闹异常。<sup>④</sup>

明末清初已经有季节性的怀梆出现，多唱于庙会酬神和年节娱乐之时。每遇丰年或年节，几乎村村唱戏，终日锣鼓声不绝于耳。各村相互竞比，赛戏、对戏之风十分红火，更进一步推动了戏曲的发展。民间盛行的祀神祭典或禳灾祈雨，均演戏以示虔诚。至于订立村规民约，调解纠纷，贺寿庆喜等亦多演戏。<sup>⑤</sup>旧时，戏曲多是在旷野或空旷处搭台演出，到了明末清初，各地的大中型庙宇，又大多修建起了戏楼，演出就有了正规的场所。博爱县盛行土簧戏，即皮黄流行于河南民间后的称谓，也称之为“土二簧”。此剧种于京剧流入前，在怀府八县颇为盛行，并带有一定的地方色彩。据《河南民报》所

<sup>①</sup> 邹古愚：《获嘉县志》卷十，《习惯》。

<sup>②</sup> 郑起东：《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163页。

<sup>③</sup> 王兴亚，马怀云：《明清河南庙会研究》，《天中学刊》，1995年第1期。

<sup>④</sup> 《河南各县社会调查·修武》，《河南统计月报》，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第一卷第十二期。

<sup>⑤</sup> 焦喜志：《谈古论今话怀梆》，《焦作文史资料》第10辑，第4页。

载《皮黄在中国歌乐之地位和文化上功用》中指出：在豫北一带，凡酬神戏，若系天神、大神、有非黄戏不领，调和大事、非黄戏客不临之俗例。<sup>①</sup>

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沁博分治，由地方绅士杜严、杨子俊、高自明等人出面，于1928年在清化六街修建了博爱县第一个戏园——中山俱乐部。俱乐部文化起源于英国绅士阶层，而此时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焦作也出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娱乐场所。豫剧最早进入焦作地区是1936年，据《博爱县戏曲志》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豫剧行戏班来博爱演出，此为豫剧来博爱之首”。<sup>②</sup>

焦作煤矿自清末开采以后，焦作已由一无名小村发展为有一定规模的煤炭工业矿区。人口日增，商业繁荣。外来职工频增，随之文化生活亦要求相应赶上。当时，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传统娱乐场所，如振阳舞台、范家戏园、吕家戏园等，这些场所多为戏曲演出。同时，焦作还出现了现代娱乐场所，如人民电影院、中站和平剧院等的修建。当时，中原煤炭公司京剧票社、醒民社已成立，经常演出于中山公园舞台。面积不大的焦作镇，日日弦歌高奏，民众争看不同剧种不同流派的艺人演唱。<sup>③</sup>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福公司修建了一个跑马场（在现人民公园旱冰场一带）。这是焦作最早的体育活动场地。以后，又在其别墅处（现焦作一中家属院）修建了几个网球场，供英人活动。<sup>④</sup>英国人的住宅，个别的室内设有舞厅，室外设有网球场。民国七年（1918年），福公司带到焦作一部手摇式无声放映机和几部黑白电影，经常在他们的住处放映，但也是仅仅供英国商人和当地的名门大户以及官员、士绅等观赏。1922年，焦作办起了第一个俱乐部——道清铁路焦作工人俱乐部。它以铁路工人、煤矿工人为主体的，以游戏、夜校等形式宣传马列主义。1930年，一些私人影片商到焦作售票放映电影，这些电影均为黑白无声影片。后在一些小学内断断续续出现了售票放映。<sup>⑤</sup>1946年，成立焦作市民众教育馆，场地较大。办有黑板报、阅览室，还开展讲演及其他多项文化娱乐活动，为解放战争服务。

总之，清末因废庙兴学，庙宇多数改为校舍，迎神赛会之事自少，至于一般农民，往往因祈雨穰疫，仍定期为神演戏。<sup>⑥</sup>另外，除了传统的戏曲、庙会之外，出现了公共

<sup>①</sup> 《河南民报》，1935年6月4日。

<sup>②</sup> 宋继光主编，博爱县文化体育广播事业局编：《博爱县戏曲志》，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编委会，1988年，第9页。

<sup>③</sup> 焦喜志：《谈古论今话怀梆》，《焦作文史资料》第10辑，第9页。

<sup>④</sup> 焦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焦作市志》第3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1238页。

<sup>⑤</sup> 焦作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焦作市志》第3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1110页。

<sup>⑥</sup> 《河南各县社会调查·博爱》，《河南统计月报》，民国二十五年，第一卷第十二期。

运动场、中山公园、中山俱乐部等现代气息的娱乐场所。旧有的戏院，多为私人营业，只有少部分人可以观赏。民国时候，政府提倡科学，设立了很多扫盲所，另设置图书馆、阅报室、民众教育管等，供人们浏览。济源地区人们的娱乐机关有县立民众教育管、讲演游艺室、中山图书馆等，据《河南统计月报》（1937年）载，有平民运动场一处，设有平台，足篮球，沙坑，铁饼等运动器具，有中山公园一处，内有各种花草，布置尚可。<sup>①</sup>

### 3.2 宗教信仰

自晚清以来，焦作地区宗教信仰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而且还吸收了英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天主教。随着焦作经济的发展，当时的社会风气是比较开放的，因此对西方宗教的态度是非常宽松的。

晚清民国时期，焦作一带的道教、佛教等传统宗教依然旺盛。博爱境内所修寺院甚多，遍及全县。如清化城内有铁佛寺，后十里店村北有白马寺，大礼园村东有吉祥寺，太行山南麓有月山寺，东王贺村有玉泉寺，唐庄村有干载寺等，几乎村村有庙。以上寺院皆为佛教僧徒进行宗教活动和修身养性的场所。民国十六年（1927）年，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提出“改造庙宇，兴办学校”的号召，下令各地“破除迷信”。其余中小庙宇多被拆毁，较大者在城镇者改为小学校，或由机关占用。僧尼多还俗或外逃，人数遽减，佛教活动一度停滞。<sup>②</sup>当时保存比较完整的只有月山寺。1938年日军侵占博爱后，月山寺被日军烧毁，寺内僧徒活动也随之绝迹。1942年，沁阳新店村有位姓殷的和廉坡村一位姓廉的，在博爱许良一带传教，敬观音，吃五戒斋，并代售各种佛像，一时信仰者甚多。<sup>③</sup>

道教在修武源远流长，从明清到民国初年，仍有很多人信仰道教。民国初年，各道院皆有信徒，据王庄范义随（1983年，77岁）回忆，他七岁时（1913年）进城隍庙当道士时，庙内共有道士28人，400亩土地，道院有土地、佃户。修武信奉道教的甚多，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多加有迷信色彩，每逢春节前后都上供、烧香敬“老天爷”。<sup>④</sup>

庙会（庙会亦称庙市，于佛道二教寺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

<sup>①</sup> 《河南各县社会调查·济源》，《河南统计月报》，民国二十六年，第三卷第三期。

<sup>②</sup> 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 宗教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页。

<sup>③</sup> 李英芳：《博爱县志》，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第591页。

<sup>④</sup> 薛垂义：《修武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91页。

附近，故名庙会）在唐代已经存在并有记载。古代的庙会，大多是香火会，也有香火会和物资交流会同时进行的。“香火之会，敬事神明，有祈有报，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并为士女游观之乐；亦惟丰年乃多盛会。县属城市乡村，会各有期：正月初八日‘火神会’，俗称‘行水’。四月‘陈州娘娘会’，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也（即泰山老母，是中国道教的重要女神之一）。九月望后，二铺营‘金龙四大王庙会’。相传十七日为大王诞辰，山阴徐渭有传。十月二十日前后，城中大会，城隍庙中祷祀不绝。”<sup>①</sup>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曾宣布废除道教的部分神祇，如风雨雷电诸神，不准再供奉，但仍然尊重民间信仰。民国十六年（1927年），冯玉祥驻守河南，倡导打神（偶像）办学。河南大部分府县城隍庙被改建为学校。大城镇道教活动基本停止，仅偏远乡村或山区的庙观和道士仍维持宗教活动。<sup>②</sup>日本侵略军占领河南后，一些庙观遭到日军破坏。

外来宗教中，基督教和天主教最为盛行。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一般可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叶，但大规模的传播则是近代的事。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成批的外国传教士也以帝国主义的炮舰为后盾涌进中国。特别是《天津条约》和《辛丑条约》签订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进入内地。内地会是最早进入河南的基督教会，并且活动范围很大，来中国的传教士多半是医生兼传教的。<sup>③</sup>

基督教传入沁阳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加拿大传教士罗布亚德在城北郊修建教堂1处，进行传教活动。随后又在北关教堂设立了教会女子学校，学生每天以祈祷开始，在会议室由教师领读和解释《圣经》、唱歌，然后祈祷。教会学校因为不收学费，所以很多家长愿意把孩子送来学习。<sup>④</sup>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基督教传入焦作。随着英商在焦作地区经济侵略步伐的加剧，在焦作地区生活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为满足其精神生活的需求，促进基督教在焦作的进一步传播。民国二年（1912年），福公司医院医生孙化吉发起了中华基督自立会，捐款修建了教堂。从此，焦作有了基督教组织。<sup>⑤</sup>基督教在焦作一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传道与医生分工明确，主要负责传道的是罗布亚德牧师、方修士牧师，信教礼拜堂

<sup>①</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sup>②</sup> 邵文杰总纂：《河南省志 宗教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0页。

<sup>③</sup> 曾友山：《河南基督教沿革述略》，《开封文史资料》第6辑，第99-100页。

<sup>④</sup> 宋家珩：《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81页。

<sup>⑤</sup> 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焦作市志》第3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1287页。

有 300 多人，许多为医院的职工。加拿大传教士在沁阳传教的方式有多种：一是救济，为穷人、病人放粮舍药，借此发展教徒；二是利用病人排队候医之机，依据病人心理，给病人传授《圣经》、唱赞美诗，这些吸引了不少信徒；三是传教士下乡传教，深入到农民的生活中，并在乡下设立多个聚会点，教人们识字念书，发展妇女信教。当时的基督教在沁阳传播很快，从《沁阳县志》民国稿中便可略见一斑：“沁阳人民之信仰有四：曰孔子、曰关岳、曰耶稣……更有耶稣教者，传自西方，英人慕牧师、挟其教旨，履沁传教，数十年来，愚夫愚妇，群趋受训，阻之不能、挥之不去，日增月盛，渐呈发扬，可知信仰之作用最大”。<sup>①</sup>

基督教除了在沁阳传播以外，温县、孟县、修武等县也有传播。1905 年，在修武县城东南租耕地数十亩，盖瓦房 18 间，作为教堂。后又盖两座外国式楼房，群众称之为“南洋场”，当时信仰该教的群众较多。1902 年，意大利神父白玉华等人来到修武传教，于 1914 年创办教会学校一所，开设文化课、神学课。<sup>②</sup>

天主教，亦称“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为基督教三大宗教之一。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福公司有天主教徒 40 人。焦作当时属卫辉（汲县）教区，由修武教堂的两位意大利神父来焦作传教，做“弥撒”。美国天主教神父韩克义来修武传教，并在教堂内成立了一所“上沽小学”，学生发展到 500 人左右。1924 年，教会学校发展到三所。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焦作划属新乡教区。新乡教区在焦作劳动街修建教堂三间，供神父传教、做“弥撒”和教徒聚会用。1940 年，新乡教区美籍主教米甘派德籍神父胡伯尔到焦作，强行接管了天主教徒阎炳南的明德学校（今胜利街小学），作为天主教的慈善机构，并吸收教徒和非教徒的孩子到学校上学。<sup>③</sup>

民国九年（1920 年）前后，新乡市天主教总堂和沁阳县分堂的美籍、英籍神甫以及博爱、武陟的传教士，先后来到温县北部的珍珠、卫村、西宋庄、亢村、小南张等村庄，布道传教。1935 年，美籍天主教神甫万德华（译音），携澳、法等籍天主教传教士，在温县城西关，购民宅一所，设天主教堂进行传教。并在县城内、东梁所、珍珠、亢村等地方，置聚会祷告场所。通过包揽讼事、开办医院、放赈济贫等手段，广收教徒，盛期全县教徒 262 人，遍布 22 个村镇。<sup>④</sup>

<sup>①</sup> 《沁阳县志》民国稿，1985 年影印。

<sup>②</sup> 康晓德：《中共修武历史 1919-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6 页。

<sup>③</sup> 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焦作市志》第 3 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 年，第 1288 页。

<sup>④</sup> 温县志编纂委员会：《温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年，第 573 页。

清真寺为伊斯兰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公共场所，教徒不仅在寺内礼拜、沐浴、斋戒、传习《古兰经》，传播伊斯兰教义，而且婚丧等宗教仪式也多在清真寺进行。历史上，清真寺的修建和穆斯林的迁徙、屯垦、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朝政府为防止回族人民的反抗，将山西洪洞县、沁阳大郎寨、孟县桑坡、博爱县阳邑等地的一部分回族农民迁入焦作造甲店。此后博爱县大辛庄、武陟县小麻村、王李庄、圪挡店、温县老德寨、辉县及甘肃的部分回族农民也相继迁入造甲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天津、唐山等地的一些回民到焦作煤矿做工，大部分住在民生街一带。<sup>①</sup>同时，也吸引了部分沁阳回民来焦作做工。随着回民人数的不断增加，焦作陆续建起了清真寺，伊斯兰教在修武西关建立了一个男女清真寺各一个，“回教信徒聚处县西关及待王镇造甲店”<sup>②</sup>，教徒不仅在寺内礼拜、沐浴、斋戒、传习《古兰经》，宣扬伊斯兰教义，而且婚丧嫁娶等宗教仪式都在清真寺内进行，寺内设有驻寺阿訇，负责宗教活动。光绪年间，桑坡村回族达万人以上，随着人口的增加，清真寺也就逐渐的多起来。民国初年，桑坡村的清真寺共有十三座，其中男寺七座，女寺六座。<sup>③</sup>

### 3.3 风俗习尚

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方文化的东渐，首先是一些大城市的传统婚姻程序受到严重的冲击，中原农村的传统婚礼仍基本按照《礼记·昏义》规定进行。然而，由于民国时期中原兵连祸结，农村经济每况愈下，不少贫穷人家在具体操作中将其中的两、三道程序合并为一道程序，使传统婚俗出现了删繁就简的趋势。同时，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推进，中原一些农村也逐步出现了新的结婚仪式。

近世常称婚礼为“六礼”，即《礼记》中所规定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些是婚姻必须遵行和应有的程序。随着时代的发展，上述六礼已经有了很大的变通，但是基本礼节一直被后世沿用。纳采，就是发动婚议，一般都是由亲戚介绍，征求女方家长意见。若女方家长认为所提的男方，堪称“门当户对”时，则开具女子的生辰八字，交与媒人持返男家合算。更详叙两个家庭的籍贯、经济状况、祖宗三代及家风等，故曰“问名”。年庚八字的核算结果，双方若无相克之处，男家就再请媒人至女家报可，并商洽订婚条件，这就是“纳吉”。等到双方互相满意，男方必须准备布帛、花

<sup>①</sup> 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焦作市志》第3卷，北京：红旗出版社，1993年，第1284页。

<sup>②</sup> 萧国楨：《修武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654页。

<sup>③</sup> 王惠民：《回族村庄——孟县桑坡调查记》，《河南省民族宗教史志资料通讯》，1984年第1期。

簪、什物、羊酒等礼物，送到女家，双方交换订婚喜帖，从此婚约成立，谓为“过媒”，也称为“换书”，即六礼之纳征。男家选择吉期，通常是双月的三、六、九等日，并将送到女方家。沁阳称之为“大送”，孟县谓之“送好”<sup>①</sup>。婚礼最重亲迎，武陟地区风俗紧遵古训，这也是婚礼最后也是关键的一步。

当时农村普遍流行“子鼠见羊万年愁，不叫白马见青牛，虎见巳蛇如刀割，兔子见龙不长久，酉鸡不与犬相见，亥猪不可见猿猴”<sup>②</sup>之类的迷信说法。由于当时社会封建思想仍然比较严重，男女双方“八字”合与不合就成为左右婚事成与不成的关键。沁阳一带另有一种习俗，男方在接到“生辰八字帖”后，还要悄悄将帖压在“灶王爷”的牌位前三天，以观“动静”，三天内家中若无争吵、打架、摔碗等不合之事，则认为吉祥，预示着可以喜结良缘，否则不能联姻。过去，合婚中的这类迷信活动，断送了很多美满婚姻。

男女婚嫁自古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择配时，除“同族不婚”、“不娶同姓”、“世有刑人不得嫁娶”之外，一直沿袭着“择门第，不论贫富”<sup>③</sup>的传统，“不讲婚财”<sup>④</sup>。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很重视婚嫁中的财礼，婚礼同时也成为一些富裕人家炫富的时机。生活的贫困，使得穷人家往往更注重财礼，“贫家女子，订婚往往索取财礼，数十元，一二百元不等，亦买卖之性质也”<sup>⑤</sup>。“近俗贫家议婚多索聘金，数十百千不等，以故穷檐妻子往往婚姻失时。”<sup>⑥</sup>

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最后临近婚期，男家需要送香烛、三牲、礼肉（一方）、礼菜（四色）、大麻糖（每件重一斤左右）、红白饼（每斤重半斤左右）、满洲果、羊酒等至女方家，以此换取嫁妆。其中，麻糖、饼、果多者至千余件，其次数百件不等，准备这些彩礼非常繁琐。因此，后来一切从略，用一两只羊代替，更有小户人家折合成钱，称为“羊红酒礼”。女方也非常重视嫁妆，因为往往到男方家中有“翻富贵”即看验嫁妆的习俗。

婚礼之日，无论贫富都准备酒食款待客人。结婚当日新郎一般都由引礼者一名陪伴去女方家，“引亲”者一般都由本家一名熟知礼数的长者担任。至女方家中首先是要拜

<sup>①</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十，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sup>②</sup> 刘永立：《河南民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

<sup>③</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6页。

<sup>④</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7页。

<sup>⑤</sup> 《河南各县社会调查·温县》，《河南统计月报》，第2卷第10期，1936年，第155页。

<sup>⑥</sup>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97页。

祖宗，体现了婚姻的宗族意义。济源一带，结婚当日礼俗与周边地区差别很大，人们认为新娘子越早接到家越好，一般都是大清早四五点钟，新郎官已经到女方家了，太阳刚出山，新娘子已经娶到家了。另外，在当地还流行哭嫁，济源当地民谣《曲曲变驴驹》中有所体现：“曲曲变驴驹，驴驹长大，打发出嫁，爹也哭，娘也哭，驹也哭，撒下小妹不会哭，拱门昏晃甩瓦屋。”<sup>①</sup>“曲曲”、“驴驹”指待嫁的女子，“瓦屋”指小孩用泥捏成个窝，甩在地上，发出声响来取乐。从歌中可看出，除了不懂事的小妹妹还在玩耍外，全家早已是哭成一团，反映了古代女子出嫁的一种习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修武地区娶亲的过程是：婚礼当天上午，女方派人去男家送嫁妆，或是男家去取嫁妆。下午由“引亲”领着新郎乘轿（少则一乘，多则三乘，富贵者八乘）或坐车，笙吹细乐伴随，前往女家娶亲。如果女家较远的，可以在婚日前把新娘送到离男家比较近的村子，方便男家迎娶，谓之“送亲”。迎娶队伍在返回的时候，不能走原来的路线，俗称“不走回头路”。但是民国年间在孟县地区出现了不同于往常的文明婚礼，“近亦有设大礼堂行文明结婚式者，但尚系少数”<sup>②</sup>。

传统婚礼仪式我们在影视节目中已经司空见惯，主要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那一套。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特殊要求，使得女子嫁到夫家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充当家庭劳动力，同时辅助丈夫侍奉父母。“多年媳妇熬成婆”，历代娶妇都很重视新人的勤俭品德和心灵手巧，在旧式婚礼中就相应的出现了一系列检验考察新人手艺的仪式，以便更好地接替婆婆操持家务。武陟县志中就有关于这一活动的记载：“新妇三日入厨具餐，以试妇职。”即婚后三日检验新妇的烹饪技术，焦作地区以面食为主，根据这一生活习惯，“试题”就是做面条，称为“试刀”，考新妇和面、擀面、切面的技术，邻居亲戚都会来吃喜面，通过品尝对新人的手艺作出评价。如果大家很满意，那么新妇身价倍增，受到大家的尊重，但如果不合格，往往就会招到大家的议论。关于这样的考试，在焦作一带很是平常。博爱地区一般第三天晚上让新妇做面条饭，谓之“试厨”。有新妇诗一首为证：三日入厨房，洗手做姜汤，不知公婆味，先教小姑尝。<sup>③</sup>

“回门”作为婚俗仪式的终结，有其深刻的内涵。该婚俗最早产生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期，体现了女子对婚姻不平等地位的抗争。济源、温县、沁阳多在婚后第二天实行回门礼，修武则是婚后第九天娘家来车接新娘回去住四天或八天再送回来，名曰“回

<sup>①</sup> 翟作正：《中国歌谣集成（河南焦作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9页。

<sup>②</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十，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sup>③</sup> 李法文：《博爱县的婚嫁和丧葬习惯》，《博爱文史资料》第2辑，第71页。

九”，<sup>①</sup>婚礼至此才算结束。富家婚礼繁杂，而穷人家的仪式比较简单些。迎娶后三日，新妇父母或伯叔父母及外祖家、姑母姨母家例来送饭，拾食榼，盛礼肉、香烛、菜、馍面等物，男方家需要摆酒席款待。至八日或九日，新妇归宁，几日往则几日还，故俗有“八对八，两头发；九对九，两头有”之说。<sup>②</sup>两头，谓男女两家也。

近代河南长期处于封建堡垒的中心区域，工业发展缓慢，同时受交通条件、教育条件等的限制，人们思想、文化意识相对落后于大城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旧俗根深蒂固。河南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状态，决定了其习俗的滞后性。婚俗相对于其他社会生活因素，收到新经济因素的影响要慢一些。如因为近世注重财礼，很多贫苦人家因为负担不起而使得男方错过了良好的婚姻时期。重男轻女一直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加上当时生活条件及其艰辛，贫苦人家很多及早把未成年的女儿送到婆家去当童养媳。另外，还有不少习惯是在儿女几岁或十几岁时定亲，也有娃娃亲和指腹为婚的。沁阳“男子十二三娶妻，女子十四五出嫁，视为惯常”<sup>③</sup>。温县“男子在十五，女子在十七即完婚”<sup>④</sup>。民国年间，北洋政府制定的《民法》中规定：“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但由于华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天灾人祸频繁，使得地区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农家子女早婚现象有增无减。

丧俗指的是人们对已故者的安葬、哀悼、祭奠等一系列的活动，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埋葬死者，使之入土为安，而是与中国传统礼制密切相关。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千百年来的正统文化。“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在实际生活中又以“孝”为行为准则。“孝”是生活中最基本的一种行为规范，“百善孝为先”。对老人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sup>⑤</sup>，养老送终之礼则成为孝的一种集中体现。丧俗也在不断演进，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繁琐的礼节。近代华北农村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影响，基本上延续了古代丧礼，其总特征为繁文缛节的厚葬久丧。

温县旧俗，人年迈备棺木（叫喜木），以柏树为上，楸树、香椿木为次之，柳木、桐木再次，忌用臭椿。<sup>⑥</sup>整个丧礼包括报丧、小敛、大敛、移灵、入葬等一系列活动。

<sup>①</sup> 薛垂义：《修武县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70页。

<sup>②</sup> 宋立梧：《孟县志》卷十，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sup>③</sup> 《河南政治月刊》，民国二十一年版，第二卷第十期。

<sup>④</sup> 《河南各县社会调查·温县》，《河南统计月报》，民国二十五年，第二卷第十期。

<sup>⑤</sup> 董江爱：《近代华北农村丧葬礼制的特点及成因》，《晋阳学刊》，1997年第3期。

<sup>⑥</sup> 温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温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603页。

当地对坟地的选址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相信祖坟所在地的风水好坏，将会影响整个家族的兴旺。因此，老人过世后家人会立刻请风水先生择茔（看定坟地），并确定土葬的时辰和日期。“始死第三日五更或半夜，孝子率有服之亲具香盘、纸钱沿路且哭且撒，逢路口则俯伏，至附近庙宇俯伏痛哭而返，孝妇则执灯送迎于门，谓之‘出纸’，意若为先灵修路者。”<sup>①</sup>葬礼的前一天晚上，要移灵，“丧葬必用鼓乐，其富者则有纸人纸马、金山银山、方弼方相、素棚糖棚、官棚看棚、古铜玩器、锦帐缎屏，经费虽巨，不以为怪。亦有家虽贫而欲炫动观听，亦竭力为之。”<sup>②</sup>古代祭祀的等级主要是看用牲的情况，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士用特牲（豕）。而武陟县志却有这样的记载：大夫庙祭用少牢，士用特牲。是祭先人尚不敢过奢也。今乡人与亲友行奠，动用猪羊杂牲、南果海味，或有祭帐挽扇及纸扎花木等物，穷工极巧，夸耀闾里，虽鬻产称贷不恤焉。虽曰情厚，未免过奢矣。<sup>③</sup>这说明清朝覆亡后，礼仪制度也逐渐崩溃，等级森严的制度有所松动。

在河南温县，操办丧事，一般都请一个主管，负责整个的事情。“温俗，丧事必延一人以懂其事，名曰总管，一切听其自为，丧主不能过问。事过则债台累累，虽富家亦多不支，以故，无财之家，往往停丧至数年或十数年，而不敢葬。”<sup>④</sup>孟县地区，一些贫穷不能操办丧礼者，则组成了“天伦会”，具体操作过程如县志上记述：“此外有天伦会，系有父母年老者，十人以上组织。会中设正副会长各一人，公直四人（均系公推），值年公直一人，系轮挨。每年正月由值年摆会一次，会员齐集值年宅上，随带香资若干，过午不到者有罚。敬神毕，值年设宴款待会员。有遭父母丧者，先报知会长，由会长通知各会员齐往吊唁。葬之前数日，由家择期出帖齐会，会员名送面粉几十斤，钱几千文，过午不到有罚，并请公直及值年经收。葬之日，又齐往设祭送葬。其香资面钱数目及酒席罚款均经全体会员规定，列载会章，至会用完时解散”<sup>⑤</sup>。“惟怀郡之人，多停棺不葬，久至数十年者，或因葬时浮费不贲，减省则畏戚邻哂笑，以致如此，是则迂谬无志，为天地间之大罪人已。”<sup>⑥</sup>

<sup>①</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sup>②</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sup>③</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sup>④</sup> 《温县志稿》卷三，《民政志·风俗》，民国二十二年。

<sup>⑤</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sup>⑥</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当地还有埋葬第三天去祭拜先人的习俗，俗称“复三”<sup>①</sup>。葬之第三日，孝子孝妇及有服之亲皆至坟蹇汤，用木桶盛水饺哭奠毕，向坟上周围泼之。又用四大生饺，内包五谷种子，埋坟四角，以能生发为有后福。

七七哭奠，是河南整个省内的习俗，为悼念死者，每七日上坟祭奠一次。豫北地区，民风淳朴，守丧时间一般超过了朱子家礼规定的二十七个月，而守制三年，不嫁不娶，以表示孝心和哀思。“自死日算起，定了七七（即七天为一节，共七个节）、百日、三个周年。每七天和百日、周年亲朋都摆祭品烧纸进行哀悼，三年满子女脱孝。”<sup>②</sup>武陟县志也有记载：谓三年之丧，必三十六月始释。<sup>③</sup>

岁时节庆风俗是中国特有的习惯，表现人们浓郁的时节意识、民间俗信、节日食俗和娱乐活动内容，通过对当时岁时节俗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民众的生活方式、水平和时尚。以时间为序，重要的岁时风俗如下：

正月：正月初一，家家户户起五更，男女老幼多换新衣服，烧香燃烛，鸣放鞭炮，拜神敬祖。无论贫富贵贱，皆吃饺子，取“一年平顺无口角”之意。然后，同姓家族中的男子要到祠堂去祭拜祖先。街坊邻里也互相拜年，给小孩子压岁钱。中午全家欢聚摆宴，吃人口馍（又称大馍，即馍上安放一个红枣）。初二，通常是女儿走娘家，以后开始走亲戚。正月初五往往被称为“破五”，家家户户吃饺子，破五之内都为过年。初六以后商店开门做生意，农家也开始干活，过年基本结束。在过年这几天内，不能将家中的渣土倒出去，名曰“聚财”。另外，正月还有“忌针”的讲究。旧时，农村妇女受苦最深，传说王母娘娘得知后，流传下了正月忌针的风俗，为的是让妇女在农闲季节养息心身。

农历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灯节”。元宵节吃元宵，并且挂灯。中国岁时节令有所谓“三元”，指正月十五上元，七月十五中元和十月十五下元。“上元”前后，剪彩为灯，张灯三日。正月十四日为试灯，十五日为正灯，十六日为乏灯。“城市居民列树竹枝，翠叶扶疏，瓦灯掩映。富豪之家亦放灯火，银花散飞，观者如堵。”<sup>④</sup>修武地区，在元宵节前后，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上元日，祀城隍与祀火神同，或至河内疙瘩坡礼孙真人祠”<sup>⑤</sup>。村里一般会举办一些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如秧歌、踩高跷、拉旱船、社

<sup>①</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sup>②</sup> 李胜甫：《温县的风土习俗》，《温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102页。

<sup>③</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89页。

<sup>④</sup> 王荣陞修，方履篋纂：《武陟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77页。

<sup>⑤</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火等娱乐活动。

道光《修武县志》卷三《輿地志下·风俗·岁时》载：“十九日，仿京都‘燕九’，祀陆真人，以羊酒旗鼓礼陆真人祠。岁丰醮钱赛会。夜‘填仓’祈谷，炊糕，设灯仓团间。”温县地区，人们蒸做“布袋”、“麦堆”等模型的面食，以盼望丰收，粮食满囤。沁阳和温县习俗相差无几，也以白面做成布袋条，供奉神灵，并歌曰：“吃布袋，喝好面，一亩地，收两石。”<sup>①</sup>河北岁时风俗区方言一致把小麦白面称作好面。

二月：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即“惊蛰节”，祀龙神。群众习惯以炒豆作食，叫做“烹蝎肚”，意为昆虫开始活动，以避免蝎蜇。“日午，以绿豆、麦粉制煎饼祭神、祀先。”<sup>②</sup>制作煎饼寓意帮龙翻身。妇女在这一天停做针线活，恐伤龙目。因为这一天的良好寓意，很多人选择在这一天剃头、洗发。

三月：清明节，多在农历三月，公历4月5日前后。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后转变成节日，并于中元、寒食一同被称为三大“鬼节”。人们在清明节前通常要上坟扫墓，缅怀先人，另伴有春游踏青等活动。

清明节也是农业生产上一个相当重要的节气。清明以后，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是春耕春种的大好季节。劳动人民根据节气的迟早安排农活，故有“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田莫迟延”、“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等农谚。

四月：相传农历四月八日为释迦牟尼的生日，此日僧尼皆香花灯烛，置铜佛于水中，进行浴佛，一般民众则争舍财钱、放生、求子，祈求佛祖保佑，出现各种庙会。在农历四月八日，各地佛寺举行佛诞进香。在北方地区则传说农历四月十八日为泰山娘娘——碧霞元君的生日，武陟地区称为“陈州娘娘会”，有些成为“奶奶庙会”。陈州娘娘者，碧霞元君。<sup>③</sup>这里四月初八也过浴佛节，但是大部分时候改为了以求子为主，而不是单纯的作佛会了。

农历三月、四月正好是农闲时节，各种庙会也集中在这个时期。依照农村多年的惯例，利用会期多进行农副产品的交流，添置必要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温县各种庙会到民国时期也一直延续着，初三日，西关会。初六日，南路皮场庙会。十一日，北路卫村会。十八日，西关会。二十一日，南路北贾村会。二十三日，西路东留石会。二十五

<sup>①</sup> 荆壬林修，刘恒济纂：《沁阳县志稿》卷八，《民族志·风俗》，民国二十六年稿本。

<sup>②</sup> 萧国桢：《修武县志》，民国二十年铅印版。

<sup>③</sup> 王荣陞修，方履篔纂：《武陟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477页。

日，东路陈家沟会，西路林村会。<sup>①</sup>

五月：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民间亦叫“端阳节”。端午节讲究不见红日外出采摘艾草，将此插在门上。有的家里煮艾草，用艾水洗脸除邪。人们大多吃粽子、糖糕、菜角，油条。并“以角黍相馈遗。取菖蒲、雄黄涂小儿耳鼻以辟虫毒，系彩线于项及手足以为厌胜”<sup>②</sup>，角黍也就是粽子。取雄黄酒涂手心、脚心、肚脐、肛门、耳窍等处，传说可以避五毒。老年人佩戴香囊，少年儿童手脚系五色线和香包，辟鬼却病。

六月：造曲，曝衣。老百姓在三伏天里最紧要的工作是做酱，所谓“伏酱腊醋”。还利用三伏天来晒衣物，晒书，给家畜洗澡。人们相信阴历六月初六这天晒衣衣不蛀，晒书书不蠹，家畜洗澡不生虱子，女人洗头可使头发一年都“不腻不垢”。<sup>③</sup>

七月：七夕，闺中祀织女“乞巧”。未婚女子聚在一起，互相赛歌做针线活乞巧。中午做素饺子，比赛谁的厨艺高。也有在月光下穿针引线，穿过的说明手巧，反则为拙。农历七月十五，民间称为“鬼节”。节前，家家要上坟，烧纸钱，祭祀祖先。凡有新丧的人家，例要上新坟，而一般在地方上都要祭孤魂野鬼，所以，它整个儿是以祀鬼为中心的节日，系中国民间最大的鬼节。博爱有首民谣《上坟谣》：“木有本，水有源，人人都有老祖先。清明节，十月一，五月纸，剪招幡，焚香化纸祭先人。”<sup>④</sup>

八月：月亮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的崇拜对象，旧时中秋人们举行祭月活动。现在这个节日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吃月饼，晚间全家人共赏明月。中秋节白天人们互赠月饼，特别是女婿要去岳父家赠送月饼盒其他礼品。有的父母给出嫁的女儿送斗面大枣糕（一斗面蒸一个糕，上面安放花草人物十分好看）<sup>⑤</sup>。

九月：重阳因其在九月九日而得名。古人认为“九”为阳数之最，月在九，日也在九，故曰重阳。重阳节，有相偕登高饮菊花酒之俗。佩戴茱萸以辟恶，健康长寿。

十二月：农历腊月初八。早饭吃“腊八粥”，也叫“八宝粥”。木楼、崇义一带多食咸粥，其余各乡多食甜粥。旧时，少女还于此节扎耳朵，俗谚“腊八腊，扎耳朵，又不疼，又不发”<sup>⑥</sup>。

冬至：二十四节气之一，没有固定日期，俗称“数九”，进入最冷季节。届时家家

<sup>①</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76页。

<sup>②</sup> 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98页。

<sup>③</sup> 殷登国：《岁时佳节记趣》，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sup>④</sup> 翟作正：《中国歌谣集成（河南焦作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sup>⑤</sup> 李胜甫：《温县的风土习俗》，《温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102页。

<sup>⑥</sup> 马修杰：《沁阳市志》，河南省沁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3年，第499页。

中午吃饺子，叫“安耳朵”，俗称“冬至吃扁，不冻手脸”<sup>①</sup>。

十二月：腊月二十三日，夜祭灶。家家烙祭灶饼，祭祀灶王爷。二十四日扫尘，“扫尘”不仅是清扫灰尘，还有驱邪除灾之意。当地老百姓有“有钱没钱，干净过年”之说。

“除夕”，换桃符，即现在的贴对联，另外还要祭祀祖先，吃团圆饭，焦作一带的习俗一般是吃饺子。爆竹之声通宵不断，不少人家聚守待旦，谓之“守岁”。燃放烟花爆竹、贴门神、挂桃符等民俗寓意深刻，既为“辟山臊恶鬼”，又为祈求全家一年平安吉祥；既有迷信的一面，又有对新一年的祝福。诚如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光辉灿烂）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总之是进入腊月之后就显现过年的气氛，特别是二十三日以后，逐日都有安排，常言说：“二十三，祭灶关；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咚咚鼓（搞年关文娱活动）；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洗萝卜；二十八，蒸馍馍；二十九，去打酒；三十黄昏煮刀头；初一五更乱点头（即磕头）”<sup>②</sup>。温县当地流传民谣：“二十三祭罢灶，女儿要花儿要炮，老汉要顶皮毡帽，老婆要筐大核桃”<sup>③</sup>。过年气氛就更加浓厚起来了。

进入民国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节俗。民国元年（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发布《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即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民国虽然以阳历取代中国传统的阴阳历（阴历），但是人们习惯用法仍是阴历，“惟公文契据则书阳历年月，以符现制”<sup>④</sup>。八月十七日，公布新礼制，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凡庆典、祀典、婚礼、聘问，用脱帽三鞠躬礼。公宴、公礼式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寻常相见，用脱帽礼。妇女礼同，而不脱帽。<sup>⑤</sup>这就改变了以往的跪拜之礼，以文明的方式进行社交。元旦当天，各官署悬旗结彩，礼堂上也悬挂国旗，由长官率所属各职员，向之脱帽行三鞠躬礼，各职员向长官行礼亦如此。商民也彼此互相庆贺，停止办公三天。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军入豫，冯玉祥极力提倡国历，改为休假五天，免除贺年之浮文，而与民同乐，举行提灯大会。凡就有年节所有之百戏，可以供人民之娱乐者，皆与此五日之内行之。<sup>⑥</sup>而旧历

<sup>①</sup> 马修杰：《沁阳市志》，河南省沁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3年，第499页。

<sup>②</sup> 薛垂义：《修武县志》修武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86年，第672页。

<sup>③</sup> 李胜甫：《温县的风土习俗》，《温县文史资料》第2辑，第102页。

<sup>④</sup> 史延寿：《续武陟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第195页。

<sup>⑤</sup> 刘景向总纂，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新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3页。

<sup>⑥</sup> 刘景向总纂，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新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7页。

的元旦，则改为春节，停止办公一天。

五卅惨案发生后，焦作民众经过激烈斗争，中原公司除了答复适当捐款外，还被迫答应组织中原公司职工会、建筑职工俱乐部、工人按年加奖、扩充医院、创办工人子弟学校等。一些现代节日也逐渐引入到生活中，其中，包括阴历年放假三天，阳历年、夏秋节、五一节各放假一天的政策。各大、中、小学，每逢星期一，聚集中山公园大舞台前，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每年3月12日的植树节，开展植树活动，十月十日“双十”节，大、中、小学校师生都到中山公园开庆祝会。各小学都组织有围术队、军乐队，不断到中山公园和围术馆举行演习、表演和比赛。<sup>①</sup>

---

<sup>①</sup> 郭景道：《焦作镇隶属修武时期的教育概况》，《修武文史资料》第3辑，第28页。

此页不缺内容

## 第四章 因煤而变：对焦作地区社会生活变迁的思考

福公司作为外资企业，它在焦作的商业经营，必然对周边环境产生了影响。一方面福公司垄断了河南的采煤业，压制了民族采煤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对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某些刺激作用。它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模式引入中国；它不仅把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了畸形发展的工业城市，而且改变了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和当地人们的生活习惯，使人们认识到采矿业是一门有利可图的事业。与此同时，它还造就并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和劳工队伍。<sup>①</sup>

### 4.1 人口结构

城市是一定规模人口的聚集区，人口变化是衡量城市近代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规模的扩大是城市人口增长的结果。城市人口的消长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反映出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和城市的性质。<sup>②</sup>从人口结构上看，焦作最初人口以男性居多，这也是矿业城市人口结构的显著特点。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福公司雇佣工人达3000名，<sup>③</sup>并有25名欧洲籍技师。随着人口的增加，福公司在紧靠泽煤盛厂的南邻修建了一条街道，外国人称之为“哲美森街”，中国人叫它为“盐店街”。街道旁兴建了一些商店、澡堂和洗发店等，这就是焦作的第一条街道。随后，美国、加拿大传教士也相继到来传教。焦作煤矿工人大部分是来自本地和道清铁路沿线的农村，技术人员多来自唐山、天津一带。1903年，福公司又从印度招募12名更夫。<sup>④</sup>道清铁路司机多来自广州。当时，外国人及家属也来到焦作居住。民国十四年（1925年），工人罢工运动，迫使侨居的英国妇孺撤离，“昨夜（指7月12日）有河南外侨约四十名抵京，多属焦作福公司煤矿中的职员。该矿已于上星期罢工，外人住宅之仆已离职，外人数名被截断食水供给，并禁止以粮食售与外人，故外人不得离境也。”<sup>⑤</sup>五卅运动期间，焦作市民参加了游行活动，据报道：“各校童子军

<sup>①</sup> 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00页。

<sup>②</sup> 闫永增：《以矿兴市：近代唐山市城市发展历史（1878-1948年）》，厦门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sup>③</sup> 《捷报》，1904年12月30日。

<sup>④</sup> 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9页。

<sup>⑤</sup> 《申报》，1925年7月14日。转引自薛世孝著《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3页。

在街上维持秩序，警察局长张君率全体警士，防阵营亦派军人荷枪站岗。游行者约六、七千人之多，而市民夹道观者，不下两三万人。声势甚为悲壮。”<sup>①</sup>可见当时的焦作市民最少已超过三万人，市区工商业人口的增多，为焦作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以中原公司二、四号井为例，“工人近六千人，大多是修武、武陟、浚县人，内中十八岁以下青工及十四岁以下童工约占工人数三分之一强，工资更半，多半做引接煤、堆煤等笨重工作。”<sup>②</sup>灾情的持续和严重，使得破产的农民不得不依靠挖煤为生，儿童也迫不得已加入挖煤的行业。煤矿的工作比较繁重，因此多数矿工也是身强体壮，以青年人和中年男性为主，“30年代初期对5万名矿工的一个调查表明，17~25岁者占25%，26~35岁这占38%，36~45岁占25%。”<sup>③</sup>

宣统元年（1909年），福公司根据《河南交涉局与福公司见煤后办事专条》相关规定，在哲美森厂附近创办了焦作路矿学堂，聘请英籍教师李恒礼等4人和中国陈筱波为教习。焦作矿物学堂的成立主要是为福公司培养采矿、筑路和冶金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同时它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矿业最高学府和河南省第一所高等学校。20年代，留美学生李鹤（敬斋）、张仲鲁相继担任校长职务。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聘用了一批留美学生为教授，聘请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教育家蔡元培等担任校董和名誉校董。<sup>④</sup>当时焦作工学院名声日振，“可与海内工程学府相颉颃矣”<sup>⑤</sup>。与此同时，焦作的中小学也迅速兴起。新式学校的兴起，为工业城市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氛围。范予遂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开始上任为道清铁路局长，那时道清铁路各主管处有从北京、上海、唐山、东北各交通大学毕业的年轻实习生、技术员等十五、六人。另外，道清铁路的修建方便了外来人员到焦作谋生，焦作市人口迅速增加，人口结构也由以往的农民、矿工，丰富为包括商人、学生、公务员在内的现代化城市结构状态。各类人才集聚焦作，三十年代的焦作已经由农业区域之旧观而成为繁盛文明的现代工商业市镇。

<sup>①</sup> 《时报》，1925年6月27日。

<sup>②</sup> 《河南焦作中原公司工人生活状况》，《列宁生活》第14期，1934年4月15日。

<sup>③</sup> （澳）蒂姆·赖特：著，丁长清译：《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1895-1937）》，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219页。

<sup>④</sup> 薛毅：《英国福公司在中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sup>⑤</sup>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17日。

## 4.2 现代城市设施的建立

福公司在焦作开矿的同时，英国人也开始着手于建立电厂，最初的是简易发电，仅供应福公司办事机构范围以内的照明。民国八年（1919年），福公司扩大规模修建了正规的厂房。供电方面开始架设两条3000伏高压线路，一条通向李河煤矿，一条通向李封、王封煤矿。从此，电力供应开始扩大至矿区居民照明，但是也仅仅是限于几条主要的街道，供电方式也是由几家有头面的任务合股经营的“光明电灯公司”向电厂买电，然后转售给居民。<sup>①</sup> 焦作从此有了先进的照明方式，电灯的使用和普及，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再仅限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种传统农业社会的单一方式，缩小了焦作地区与现代城市的差距，开启了焦作地区近代生活的新纪元。

民国九年（1920年），焦作中原煤矿公司在矿区东部李河矿场附近建成土木结构瓦房100间，后称为百间房。中原公司为了满足在百间房居住的各阶层，特别是上层人群的需要，又在百间房建设了花园、医院、剧院、游戏场、学校、庙宇、商业街。有一万多人居住在此，全天24小时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晚上灯火辉煌（焦作1919年就用了电，在全省是最早的）。百间房当时被誉为焦作的“小上海”。<sup>②</sup>道清铁路通车之后，焦作境内的公路网也逐渐完善，突破了太行山所造成的交通不便，将太行山区内外的市场连接起来，“自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商福公司开采煤矿、建设铁路后，地利开发，交通便利，工商发达，与时俱进，俨然为豫省西北之重镇。在民国六七年间（1917—1918年），为焦镇最盛之时代。笙歌彻夜，共乐升平……市面电灯、电话及自来水种种设备颇臻完善，渐呈繁华气象。”<sup>③</sup>按照西方生活要求和城市规划建设起来的新式马路、城市垃圾处理系统，以及煤气、电灯、电话、自来水这些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都在焦作率先出现。<sup>④</sup>

为保障英人及其矿厂财产的安全，福公司还敦请清政府派驻军队和司法机关对该地进行公共管理。现代城市管理方式进入焦作，清廷在当地设立了弹压所，委任怀庆府镇台署理所务。<sup>⑤</sup>尽管福公司在华开矿期间，英国政府的支持始终贯穿其中，但中国官民的抗争，也使其在华矿权不得不由垄断转向与中方共享。而它所获矿业利润的相当部分，

<sup>①</sup> 廉捷：《太行山脚下的一颗明珠——漫话焦作电厂》，《焦作文史资料》第3辑，第10页。

<sup>②</sup> 王好东，薛秋杰：《二十世纪初的“小上海”——百间房村》，《焦作市山阳区文史资料》第1辑，第125页。

<sup>③</sup> 李燕：《道清铁路旅行指南》铅印本，1933年。

<sup>④</sup> 王敬平：《英商福公司与焦作近代煤炭城市的形成》，《焦作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sup>⑤</sup> 郭景道：《旧焦作的东西两衙门》，《焦作文史资料》第3辑，第36-37页。

也被迫用于对中国官方的报效和补助地方公益事业。福公司出于矿厂生产和职员生活的需要而着力推进的社区规划和城市建设，成就了焦作一带乡村的市镇化。<sup>①</sup>据 1922-1923 年《河南焦作全图》记有大街小巷 9 条；1947 年《焦作防御要图》载，有大街小巷 25 条。1948 年，焦作解放时，城廓为一南北长方形，面积 2.5 平方公里，人口达到 2.85 万人。<sup>②</sup>

---

<sup>①</sup> 王守谦：《煤炭与政治 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22 页。

<sup>②</sup> 郜世忠：《豫西北一颗璀璨的明珠》，《焦作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17 页。

## 结语

社会生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20世纪是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焦作城市化的关键时期。福公司是一家在中国内陆经营时间最长、活动范围较广的大型英资企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福公司攫取了豫北地区的煤矿开采权，并迅速增加资本，建厂开矿。福公司的进入，使得焦作各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政治的附属物，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福公司对煤炭的开采是强权行为，加剧了当地的半殖民地化，压制了民族开采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福公司在强行进入焦作之后，随之发展了产业，带动了当地的城市发展和人们思想的转变，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城市。

英国福公司在焦作的煤炭开采，使得人们注意到煤炭开采的有利可图，并且招收了大量的煤矿工人。豫北灾荒的频发和战争的祸害，使得人们不得不依靠挖煤谋生。英国在进行矿产掠夺的同时，客观上解决了一批人的生计问题。民间落后的生产技术，使得多数土窑经不起外来机械化的冲击而破产。为了生存和发展，焦作民众在福公司抗争的同时，也开始学习先进的技术，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焦作从一个自然村发展成现代化城市，在这过程中，当地人们的服饰、饮食、居住、交通和社会风俗发生了变化，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城市规模和功能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进步。中小学校的创办和新思想的传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脱离封建束缚，部分女性也开始接受教育。其他文化娱乐设施或团体得以创设，如图书馆、报刊、俱乐部等，丰富了民众的日常生活。

总的来说，英国福公司来焦作采煤掠夺了中国的矿产，给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同时对资本的追求使得矿工生活异常困苦。但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与进步来看，这一时期正是焦作崛起的年代。当地社会生活在现代转型中新旧并存、中西杂糅，显示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扭曲特征，体现了旧事物顽强阻滞新事物成长的沉重历史惰性。

此页不缺内容

## 参考文献

### 著作类:

- [1] 乔志强. 中国近代社会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年.
- [2] 乔志强, 行龙.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年.
- [3] 严昌洪. 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年.
- [4] 薛毅. 焦作煤矿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5] 薛毅. 英国福公司在中国[M]. 武汉:武汉人民出版社, 1992年.
- [6] 王守谦. 煤炭与政治——晚清民国福公司矿案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 [7] 薛世孝. 中国煤矿工人运动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8] 赵宗军. 中西部的希望之星——焦作[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9] 郑起东. 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年.
- [10] [晋]郭璞注, [清]毕沅校. 山海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 [11] 康晓德. 中共修武历史(1919-1949)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12] 中共沁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沁阳历史(1919-1949)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 [13] 卜凯著, 张履鸾译. 中国农家经济[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
- [14] (澳)蒂姆·赖特. 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1895-1937) [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1年.
- [15] 殷登国. 岁时佳节记趣[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
- [16] 翟作正. 中国歌谣集成(河南焦作卷) [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 [17] 谷中原. 交通社会学[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年.
- [18] 宋家珩. 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M].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年.
- [19] 程民生主编. 近代河南经济史(下) [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年.
- [20] 耿光连. 社会习俗变迁与近代中国[M]. 济南:济南出版社, 2009年.

### 方志类:

- [1] 萧国楨. 修武县志[Z].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
- [2] 方履籛. 武陟县志[Z].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6年.
- [3] 史延寿, 王士杰. 续武陟县志[Z]. 民国二十年.
- [4] 段继武. 温县志稿[Z]. 民国二十二年.
- [5] 林传甲. 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Z]. 北京:武学书馆, 1920年.

- [6] 宋立梧. 孟县志[Z]. 民国二十一年刊本.
- [7] 刘恒济. 沁阳县志稿[Z]. 民国二十六年稿本.
- [8] 李燕. 道清铁路旅行指南[Z]. 铅印本, 1933年.
- [9] 马修杰. 沁阳市志[Z]. 河南省沁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3年.
- [10] 李英芳. 博爱县志[Z].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4年.
- [11] 薛垂义. 修武县志[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年.
- [12] 河南省焦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焦作市志[Z]. 北京: 红旗出版社, 1993年.
- [13] 邵文杰. 河南省志 宗教志[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 [14] 焦作矿物局史志编纂委员会. 焦作煤矿志（1898-1985）[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 [15] 济源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 济源市志[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 [16] 温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温县志[Z].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1年.
- [17] 刘景向总纂. 河南新志[Z].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年.
- [18] 赵尚兴. 焦作市建筑工程志[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
- [19] 宋继光. 博爱县戏曲志[Z]. 郑州: 中国戏曲志河南卷编委会, 1988年.
- [20] 吴世勋. 分省地志——河南[Z]. 上海: 中华书局, 1927年.
- [21] 交通部邮政总局. 中国通邮地方物产志·河南编[Z].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年.

#### 报刊类:

- [1] 《申报》，1920年9月26日。
- [2] 《晨报》，1920年年9月19日。
- [3] 《捷报》，1904年12月30日。
- [4] 《申报》，1925年7月14日。
- [5] 《北华捷报》，1904年12月30日。
- [6] 《东方杂志》，1909年第7期。
- [7] 《豫北日报》，1935年12月17日。
- [8] 《河南民报》，1935年6月4日。
- [9] 《时报》，1925年6月27日。
- [10] 《向导》，1926年7月28日。
- [11] 河南省赈务会编，《河南省各县灾情状况·豫灾弃言》，1929年8月。
- [12] 《列宁生活》，1934年4月15日。
- [13] 《河南政治月刊》，民国二十一年。
- [14] 《向导》，1926年，第165期。
- [15] 《新人》，1934年，第13期。

- [16] 《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汇刊》，1931年4月。
- [17] 《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
- [18] 《河南政治视察》，民国二十四年编印，河南省政府秘书处。
- [19] 《交通杂志》，1934年第二、三期合刊。
- [20] 《河南统计月报》，1935年第一卷第十二期。

### 资料性文献：

- [1] 丁世良, 赵放.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Z].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年.
- [2] 陈伯庄. 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Z]. 上海: 中华书局, 1936年.
- [3] 水利水电科学院等编. 清代黄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Z].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年.
- [4] 河南省总工会共运史研究室编. 焦作煤矿工人运动史资料选编[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焦作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焦作文史资料第3辑[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
-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修武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修武文史资料第4辑[Z]. 1993年.
- [7]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济源市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济源文史资料第1辑[Z]. 1991年.
- [8] 政协焦作市山阳区委员会编. 焦作市山阳区文史资料第1辑[Z]. 2002年.
-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河南文史资料第8辑[Z].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武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武陟文史资料第1辑[Z]. 1988年.
- [11] 中共焦作市委党史征编办公室编. 中共焦作党史资料选编 一、二战时期中共焦作党史资料选编 一、二战时期[Z]. 1986年.
- [12] 政协河南省温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温县文史资料第1辑[Z]. 1989年.
- [13] 政协博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博爱文史资料第6辑[Z]. 1991年.
- [14] 政协河南省孟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孟县文史资料第2辑[Z]. 1990年.

此页不缺内容

## 致 谢

岁月如歌，光阴似箭，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已接近尾声。经历了找工作的喧嚣与坎坷，我深深体会到了在学校学习的那份珍贵。回首三年的求学历程，对那些引导我、帮助我、激励我的人，我心中充满了感激。

至此，谨向三年来所有指导、帮助和关心过我的师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首先要感谢我尊敬的导师王守谦老师，从论文题目的选题、资料的引用、论文的修改，王老师都给予我很大的指导和帮助。对于自己的恩师，我始终怀着“七分敬仰、三分畏惧”之情。在我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深深受益于王老师的关心、爱护和谆谆教导。王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广博的学术造诣，生活中平易近人的作风都深深感染着我。在平时的教学中，导师针对我的性格很注重对我的教育，让我了解到以后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不仅应具备的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教学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其次，我要感谢所有教导过我、关心过我的老师。特别是专门史专业的李永芳教授、李长印教授、苏全有教授、李海红教授、阎盛国教授等，感谢他们的谆谆教诲和辛勤培育，使我懂得作为一名历史学习者应该怎样不断追求进步。相信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会更让我受益匪浅。

感谢一直关心与支持我的同学和朋友们！感谢的是我寝室的姐妹赵静、孙红娟同学，以及2010级研究生的翟芳、马慧贤、岳培红等同学。三年来，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学习讨论，感谢你们给予我的所有关心和帮助。同窗之谊，我将终生难忘！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父母。父母的养育之恩无以为报，他们是我十多年求学路上的坚强后盾，在我面临人生选择的迷茫之际，为我排忧解难，他们对我无私的爱与照顾是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赵倩倩

2013年5月于河南师范大学

此页不缺内容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历史的细节与历史研究的“细化”——浅谈〈申报〉在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应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5期。
- 2、《对高校图书馆与资料室关系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公共图书馆》，2012年第1期。
- 3、《对近代中国旅游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 4、《北宋河南的城镇饭馆》，《河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1年第1期。

此页不缺内容

## 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河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赵倩倩 日期： 2013.5.28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河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河南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作者签名： 赵倩倩 导师签名： 刘宇峰 日期： 2013.5.28